

《明心寶鑑》非秋適編著說考述

周安邦*

摘 要

《明心寶鑑》，是中國翻譯史上第一部翻譯成西方文字的漢文古籍，由現今存在最早版本推斷，其編者應為中國明代的范立本。在流行的韓劇《大長今》中，曾描述女主角自小聰明伶俐，刻苦好學，七歲就學完了《千字文》、《明心寶鑑》等書，可見出《明心寶鑑》一書很早就進入韓國文化之中，其影響甚至持續至今。有關該書編者的問題，在韓國就普遍流行著由高麗朝儒臣秋適編纂之說。然綜觀全書，其內容皆出自中國歷代經典中的格言、警句，與高麗之文獻完全無涉，其背景與思想也與宋明理學相關。因何該書會出現高麗朝儒臣秋適編纂的看法？又在何種時空背景下促使秋適與《明心寶鑑》牽連上關係？此問題在學術界中至今尚未有學者深入釐析。本文藉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秋溪家乘》中存留的歷代序、跋等文獻，再配合《高麗史》、《朝鮮史》與《明史》等相關資料研究之結果推斷，《明心寶鑑》一書為秋適編纂之說的關鍵，都來自於秋氏後裔秋世文戮力之規劃，由《秋溪家乘》再延伸至《明心寶鑑》，逐步作實了秋適編纂《明心寶鑑》之說法。

關鍵詞：明心寶鑑、朝鮮、秋適

*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壹、疑義之緣起

朝鮮自古以來受漢文化影響極深，至今在韓國還保存著數量驚人漢籍，僅以漢城大學奎章閣所藏韓國本為例，據 A.D.1981 年出版的《奎章閣圖書韓國本綜合目錄》，就達 33088 種。其中除少數小說類為「國文」（韓文）部分，絕大多數都是漢籍。在現存韓國的漢籍中，文集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如《韓國文集叢刊》已出版 350 冊，收文集七百多種；《韓國歷代文集叢書》3000 冊，平均以一集一冊計算，也達 3000 種。中國的儒學向東傳播普及至朝鮮，對於韓國之文化影響深遠。儒學的傳播隨著佛教的東傳，在三國時期傳進朝鮮。儒家思想真正深入韓國文化，是在 A.D.1392 年李氏朝鮮取代高麗王朝之後，由於高麗王朝腐敗墮落，社會風氣敗壞，繼之而起的李朝，于 A.D.1394 年在首都漢陽推行「崇儒排佛」政策，正式尊儒學為國教。在儒教盛行的朝鮮時代（A.D.1392-1896），《明心寶鑑》這類的儒書開始在朝鮮廣為流傳。

現今普遍流傳韓國民間的《明心寶鑑》，大多為 A.D.1454 年刊行的《清州本》之「抄略本」，這一類的傳本刻意的將該書三教雜揉中的佛教思想大量刪除，以符合當時「崇儒排佛」的政策與社會風氣，實際的內容僅存《清州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可以說是原始版本的刪節本。「抄略本」在朝鮮民間廣為流行，是朝鮮時代末期民眾認識儒學的重要讀物，亦是貴族子弟面對科舉所必讀的教材，在當時的庶民教育機關及書院等場所廣泛的流傳著。在傳播的過程中，「抄略本」還在其後加入了朝鮮固有的「增補篇」之內容，以符合地域性與時代環境之需求。朝鮮自古與中國交流頻繁，因此該書在韓國的教育中亦受到極度的重視，甚至目前在韓國的大學中，還有教授專門以此書為教材開設相關之課程。時至今日，在韓國許多與文化或教育相關的網站上，都可輕易的見到「抄略本」《明心寶鑑》的內容。諸多的「抄略本」中，最有名的要算是大丘仁興本的《明心寶鑑》。

在韓國有關《明心寶鑑》成書的文獻資料中，最早的編著者之說法，乃是來自於韓國的仁興齋舍本所載之「秋適說」。A.D.1971 年 12 月 15 日，《韓國日報》曾報導有關「明心寶鑑木刻板發現」的消息：A.D.1971 年 12 月 13 日，慶尙北道達城郡城西面本里洞（舊名仁興洞，現今南韓大邱廣域市）仁興書院大樑裏發現了「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的木刻版（一般稱大丘仁興本），這是朝鮮王朝末期的高宗六年（A.D.1868）時所製作，在此本的幾篇序、跋中都提到，該書編者為高麗忠烈王時期（A.D.1275-1308）的儒臣秋適（A.D.1246-1317）。同樣的訊息也見諸於陳慶浩〈第一部翻譯成西方文字的中國書…《明心寶鑑》〉

一文之中。¹「仁興齋舍本」文末的〈跋〉文中曾提到，此書為秋適之二十代孫秋世文於 A.D.1869 年時，將其改訂後重新刊行於世。大丘仁興本《明心寶鑑》的內容，只有十九篇、兩百四十二條，僅為現今所見全本的三分之一。由於《明心寶鑑》一直是韓國學習漢文的重要典籍，初期成書的過程已難考察，但數百年間，它在朝鮮流行的版本，卻都僅以本文刊行，前既無序，後亦無跋，更不詳其編者姓氏。大丘仁興的刻本一出現，不但前後各有名家的五篇〈序〉文及四篇〈跋〉文，且在凡例中還提及「露堂先生哀菴詔後學之書，獨賴此篇之存，世遠版刊，多有訛誤，故改正鋟梓」之說法。²

此本一出，韓國學者紛紛據以探討立論，主張《明心寶鑑》一書乃高麗忠烈王（A.D.1275-1308）的儒臣秋適所編著的漢學基本教材，其時代遠早於明代的范立本與王衡之刊本，³係韓國編著，而非中國舊編。今日所見之「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計有朝鮮時代著名學者五篇序文、四篇跋文及四種秋適生平相關文獻資料，其中《朝鮮歷代名臣錄》之〈金錫奎露堂行狀記〉中已提到秋適之生卒年，分別為高宗丙午（高麗·高宗 33 年，A.D.1246）及丁巳（高麗·忠肅王 4 年，A.D.1317），若秋適即為《明心寶鑑》最初之編者，那該書應在 A.D.1317 年以前即已編成，這就較署名范立本於景泰五年（A.D.1454）所輯之「清州本」，更早出 137 年之久。此外，在大丘仁興本中李栗谷（李珥，A.D.1536-1584）就曾同時為該書留下序文與跋文，並於跋文末明確標出了「嘉靖庚戌三月」之時間，嘉靖庚戌為明·嘉靖二十九（A.D.1550）年，也就是說大丘仁興本《明心寶鑑》，最遲在明·嘉靖二十九年時就已刊行傳世。由內容考察，一本完全摘錄中國歷代三教經傳、百家格言、警句的書籍，其中未見徵引任何朝鮮著家之文句，卻是由忠烈王時代的朝鮮學者來編纂，這樣的說法到底能不能符合史實的驗證？實有進一步釐析之必要。

近人李朝全在點校譯注《明心寶鑑》中曾提到：「根據現在刊印的朝鮮文（韓文）版《明心寶鑑》來看，秋適初撰《明心寶鑑》一說可以采信。此書明初傳入中國，范立本可能重新進行了編輯整理，從而形成一個由二十篇六、七百段文字組成的新版《明心寶鑑》。經范立本整理後，《明心寶鑑》條理、結構更明晰，內容網羅了儒、釋、道各家學說，從而成爲一部修身養性、安身立命的寶典，從

¹ 陳慶浩，〈第一部翻譯成西方文字的中國書…《明心寶鑑》〉，《中外文學》第 21 卷第 4 期，1990 年 9 月，頁 73-87。

² 見韓·秋適著，金鍾國譯，《國譯增補明心寶鑑》所錄之「凡例」，韓國·成均館大學校，檀紀 4292（1959）年，頁 208。此外，和刊朝鮮秋適本《明心寶鑑》之「明心寶鑑凡例」第一條亦有「露堂秋先生文憲公，諱適，高麗忠宣朝，官門下侍中平章事，密城伯。哀菴詔後學之書，獨賴此篇之存，而世遠板刊多有訛誤，故改正鋟梓。」之紀錄。見《明心寶鑑》，著作兼發行者秋丙九，印刷者朴善奎，昭和二年（A.D.1927）二月二十日發行。

³ 有關《明心寶鑑》范立本與王衡刊本之問題，可參見筆者博士論文「《明心寶鑑》研究」之第三章「《明心寶鑑》之成書與編者」，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年 6 月。

明初起即極為盛行，多次重刊、重印，萬曆皇帝還讓人重輯修訂一遍。」⁴這段文字中，李朝全採信了高麗時期秋適編纂《明心寶鑑》一書的說法，並且認為明朝初期的范立本，應為該書整理重刊之人物而非原編著者。若此說確實的話，那《明心寶鑑》就是第一部由高麗傳入中國的朝鮮典籍了？可是遍尋中國與朝鮮古籍的圖書目錄，卻未見此書由朝鮮傳入中國之迹證。又李朝全點校/譯注《明心寶鑑》書前導言〈《明心寶鑑》：一本有生命力的書〉一文中，曾提到其所見北京、台灣及海外的版本計有 12 種，⁵卻未曾出現韓國的版本，僅於書前所附的書影中可見到韓國·明文堂出版、金星元譯著的《新譯明心寶鑑》。⁶在近代韓國重新整理的大丘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中，以韓國·成鈞館大學校出版、秋適著，(韓)金鍾國譯的《國譯增補明心寶鑑》最為完整，書中不僅詳錄了秋適相關的生平資料與原書之〈序〉、〈跋〉，而且還對「秋適本」與韓國當時的流傳本作了詳實的比較，是研究秋適編纂《明心寶鑑》之說的極重要材料。李朝全於導言中未明言「秋適說」之依據，又未見徵引秋適有關之史料徵實，其說在立論上已有失之武斷的疑義。李朝全採信秋適編書之說所據何來，在文中既未曾交待，為釐析此一問題，以下筆者試圖由朝鮮秋氏後人所留下的各類文獻及歷史資料，對秋適著《明心寶鑑》之說作一討論。

⁴ 見李朝全點校/譯注《明心寶鑑》書前導言〈《明心寶鑑》：一本有生命力的書〉（北京·華藝出版社，2007年1月），頁3。

⁵ 同注4，頁2。李朝全所見之版本計有：1、北京國家圖書館普通古籍閱覽室收藏有1368年刊印的《校正刪補明心寶鑑》。2、北京國家圖書館普通古籍室還收藏有《新鐫校正明心寶鑑正文》，扉頁上題“官板正字明心寶鑑”，“橋村莊三聖堂行”。3、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室藏有1553年刊印的《重刊明心寶鑑》（二卷）。4、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室藏有1621年刊刻的標明“范立本集”《新刻音釋明心寶鑑正文》（二卷）。5、北京國家圖書館收藏有明萬曆皇帝《御制重輯明心寶鑑》二卷（根據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影印），成書於1585年。6、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有1957年由越南孔學會編《明心寶鑑》。7、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有1601年（明萬曆辛丑本）刊印的范立本集《新鐫提頭音釋官板大字明心寶鑑正文二卷》（根據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原版存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新鐫提頭音釋官板大字明心寶鑑正文》二卷（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書林鄭繼華刻本）。】。8、臺灣（應為台大收錄之微卷）還收藏有明初刊黑口本線裝《新刊大字明心寶鑑二卷》。9、越南西貢市信德書社印行的MINH-TAM BUU-GIAM翻譯過來的《明心寶鑑》（楊孟徽譯）。10、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室《重刊明心寶鑑》二卷（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曹玄刻本）。11、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室《新刻音釋明心寶鑑正文》二卷（明末刻本）。12、日本《新修成篋堂文庫善本書目》有《新刻官板音釋明心寶鑑正文》二卷（明中期刻本）。

⁶ 同注4，書前之書影。李朝全所附之書影，實為韓國·金星元譯著，《新譯明心寶鑑》（韓國肅蘭·明文堂出版，2000年）。

貳、秋適生平概述

依據《秋溪家乘》卷之一「世系」中記錄，秋適本為宋代漢人之後。⁷其祖父秋鎰，在南宋高宗時位及門下侍中，于高麗仁宗時東來朝鮮，定居於咸興蓮花島，是為秋氏之始祖。其嫡孫秋適，自幼精于文章書法，博通百家，官及民部尙書藝文館大提學，忠烈王 31 年任國學教授時，為使文字啓蒙之幼兒有一學習古典之入門書，在各種經書和諸子百家詩賦中，取其易懂又具深意的兩百六十個字，分成十九篇編成《明心寶鑑》。此書成為日後數百年間初學者之道義教本，朝鮮理學家李珣（栗穀）曾數次詳議此書，並為之作〈序〉與〈跋〉文，今皆收入於「仁興齋舍本」之中。朝鮮理學西山大師亦熟讀此書數遍，並將之錄至自己之著作《儒家龜鑒》中。目前在大邱市郊花園面所在地之秋適祠堂的仁興院中，尚保存著《明心寶鑑》木刻版一百六十餘枚。

現今韓國·成均館大學校出版、秋適著，（韓）金鍾國譯的《國譯增補明心寶鑑》，主要是以大丘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為底本，其書後附有朝鮮時期諸多名家的序、跋與評述，是研究有關秋適與《明心寶鑑》重要的資料。此外，由秋氏後代孫秋世文所主編的《秋溪家乘》，完整的記錄了朝鮮秋氏家族事蹟的重要演變，亦為探究秋適生平與《明心寶鑑》關聯的明確文獻。

由朝鮮·金錫奎所撰的〈露堂行狀記〉所述，可知秋適為高麗·高宗丙午至忠肅王丁巳年間人，⁸高宗丙午年為高麗·高宗 33 年（A.D.1246），忠肅王丁巳為高麗·忠肅王 4 年（A.D.1317），這樣的生卒年代亦符合《秋溪家乘》卷之一「世系」中的記載。⁹若秋適即為《明心寶鑑》最初之編者，那該書應在 A.D.1317

⁷ 《秋溪家乘》卷之一「世系」下記錄著：「一世諱 鎰，宋高宗（高麗仁宗朝）紹興十一年辛酉文科，官籍符羅，墓海東咸鏡道咸興府蓮花島子坐。二世諱 篔，號悔庵，高麗神宗元年戊午生，康宗二年癸酉文科，官至諫官真提學理部尙書藝文館大提學門下侍中，高宗四十四年丁巳十月十八日卒，諡文正。三世諱 適，字慣中，號露堂，高麗高宗三十三年丙午生，元宗元年庚申文科調安東書記真史館，遷左司諫民部尙書致仕。忠宣朝召拜門下侍中平章事，封密城伯。忠肅王四年丁巳七月七日卒。七年庚申，諡文憲。墓慶尚道大丘府仁興坊午坐，有二子，次諱雷，自威聲，號益齋，官司諫。……」見《秋溪家乘》卷之一「世系」，韓國·慶尚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秋溪家乘》四卷，由梧林·金相朝氏於 1996 年 11 月 3 日寄贈，頁 1-4。

⁸ 《國譯增補明心寶鑑》在文末「明心寶鑑解說」中，所收錄有來自於《朝鮮歷代名臣錄》之「金錫奎露堂行狀記」。見韓·秋適著，金鍾國譯，《國譯增補明心寶鑑》所錄之「編著者」，韓國·成均館大學校，檀紀 4292（1959）年，頁 187-188。《國譯增補明心寶鑑》所收錄的「金錫奎露堂行狀記」，為一節錄之文章，僅摘錄秋適生平重要的陳述，且文中尚有些許錯字，該〈行狀〉的全文，可見諸於《秋溪家乘》卷之一〈行狀〉第 9-12 頁之中，韓國·慶尚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秋溪家乘》四卷，由梧林·金相朝氏於 1996 年 11 月 3 日寄贈。

⁹ 《秋溪家乘》卷之一「世系」記載：「三世諱 適。字慣中，號露堂，高麗高宗三十三年丙午生，元宗元年庚申文科調安東書記真史館，遷左司諫民部尙書致仕。忠宣朝召拜門下侍中平章事，封密城伯。忠肅王四年丁巳七月七日卒。七年庚申，諡文憲。墓慶尚道大丘府仁興坊午坐，

年即已編纂成書。秋氏生於高麗高宗 33 年，在朝鮮·鄭麟趾（A.D.1396-1478）等纂修《高麗史》卷一百六〈秋適傳〉中，曾記載其相關的生平事蹟：

秋適，忠烈朝人。性豁達，無檢束，登第，調安東書記，選直史館，累遷左司諫。閩人黃石良寅緣用事，陞其鄉合德部曲為縣。適不肯署名，石良與內豎石天補金光衍，乘間譖之。王怒，即令械囚巡馬所。押者謂適曰：「可由徑行。」適不可，曰：「凡有罪者皆歸有司，未有枷鎖于王所者。吾當行通衢，使國人見之。諫官而枷，榮亦足矣。何必効兒女子掩面委巷乎？」官至民部尚書、藝文館提學，致仕。適老尚善飯，常言：「享客但軟炊白粒，割鮮作羹可矣。何必費百金致八珍耶？」¹⁰

《高麗史》由 A.D.1392 至 1451 共歷時 59 年才完成，經歷李氏朝鮮太祖、太宗、世宗、文宗四朝，期間史書經過多次修訂，編纂者有鄭麟趾等多人，全書於文宗元年八月（A.D.1451）完成。在《高麗史》中已提到，秋適行不由徑的正直光明作風及飲食節儉的性格，可見出生性豁達、忠烈儉樸的儒者風骨。高麗·忠烈王在位期間為 A.D.1275-1308，這也符合金錫奎所撰的〈露堂行狀記〉中所提秋適的生平，但在距秋適存在年代最近的《高麗史》中，卻未曾提及秋適與《明心寶鑑》一書有任何之關聯。秋適之祖先原來自中國，據《韓國人族譜》之記載，在南宋高宗時位及門下侍中之秋磕，於高麗·仁宗時東來韓國，定居於咸興之地。另在《韓國人族譜》「全州·秋氏」下還有載有一段秋適之略傳：

秋適，高麗人。字慣中，號露堂，諡號文憲，官職大提學。忠烈王時文科及第，任安東書記、直史館、左司諫、民部尚書，以藝文館大提學致仕。編述《明心寶鑑》教授學徒學問、文章。¹¹

《韓國人族譜》編纂於 A.D.1982 年，與《高麗史》比較不同的是，此處出現了「編述《明心寶鑑》教授學徒學問、文章」的敘述，「編述」到底是不是「編著」，在僅有的敘述中無法證實，不過這種說法倒與前述李朝全的論點相似。當然編著族譜須以實證為據，編者絕非刻意憑空捏造秋適與《明心寶鑑》之關係，

有二子，次諱雷，自威聲，號益齋，官司諫。」見《秋溪家乘》卷之一「世系」，頁 1。韓國·慶尚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秋溪家乘》四卷，由梧林·金相朝氏於 1996 年 11 月 3 日寄贈。

¹⁰ 見韓國奎章閣所藏貴重圖書 3539 號，朝鮮·鄭麟趾等纂修《高麗史》卷一百六·列傳第十九〈秋適傳〉，第 64 冊，頁 29。

¹¹ 見《韓國人族譜》「全州·秋氏」，韓國人族譜編纂委員會，韓國·日新閣圖書，1982 年 11 月，頁 1243。

然由 A.D.1451 的《高麗史》到《韓國人族譜》編纂的 A.D.1982 年間，因何會出現了秋適「編述《明心寶鑑》」的說法呢？此中之連結就得再回到秋適與《明心寶鑑》相關的資料中探尋。

參、秋適與《明心寶鑑》之關聯

考之朝鮮文獻，最早對秋適生平事蹟之記述者為《高麗史》卷一百六之〈秋適傳〉，後世有關秋適的事蹟，多由此段史料擴充增補，而最完整的敘述應為《秋溪家乘》卷之一〈行狀〉第 9-12 頁的金錫奎之〈行狀〉，而此篇〈行狀〉也間接記錄了秋適與《明心寶鑑》最早之關聯性。金錫奎之〈行狀〉云：「麗朝理學宗師，有露堂先生，姓秋，諱適，字貫中，露堂其號也。……沿革之後，文獻無徵，遂學異見，莫能窺其淺深，為後學之齋咨永歎。屢經兵燹，並失其衣積之藏，子孫之瞻，掃寓慕久，無其地矣。逮我哲憲癸丑，始搜幽宅，於達城南花園舊地，據失傳不知幾百歲，噫！其異矣。諸孫因以盡誠多士，為之成美，構齋於墓下為俎豆虔奉之所，豎碑於齋之前，圖紀績不朽之道，幽顯儘有時矣。……所著篇秩遺失殆盡，獨《明心寶鑑》一篇行于世。……崇禎紀元後四甲子秋，知義金錫奎謹撰。」¹²金錫奎之〈行狀〉撰於崇禎紀元後四甲子秋，即清·同治三年(A.D.1864)，文中稱秋適為「麗朝理學宗師」，明確指出了秋適與宋明程朱理學之關係，此點在其〈行狀〉末也以「時程朱書始自中國來，東土人士咸知尊尚而依歸」¹³之陳述加以印證。此外，金錫奎也指出了秋適所著之文籍，「獨《明心寶鑑》一篇行于世」，將《明心寶鑑》的著作權歸諸於秋適身上。再詳考此文便可發現，這樣的看法其主要的依據與事實，則來自於秋適後代子孫於「哲憲癸丑」年間，於達城南花園舊地幽宅豎碑、齋祀、建祠之舉。參照金錫奎之〈行狀〉撰寫的年代，「哲憲」，即李氏朝鮮之憲宗與哲宗，而「哲憲癸丑」則應為李氏朝鮮哲宗 4 年(A.D.1853)，即清·文宗咸豐 3 年。也就是說，秋適與《明心寶鑑》之關聯最早出現的時代應為 A.D.1853 年，在此之前於朝鮮典籍中並未發現秋適著述《明心寶鑑》的記錄。此後秋適與《明心寶鑑》有關的敘述突然蜂擁而出，以下筆者便依收錄之文獻，簡要的整理如下：

¹² 見《秋溪家乘》卷之一〈行狀〉第 9 頁，韓國·慶尚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秋溪家乘》四卷，由梧林·金相朝氏於 1996 年 11 月 3 日寄贈。

¹³ 見《秋溪家乘》卷之一〈行狀〉第 12 頁。

表一·《國譯增補明心寶鑑》中有關秋適與《明心寶鑑》關聯之資料			
	出處	原文摘錄	備註
1	《晦軒實記》 卷五附錄	秋適，字慣中，秋溪人，號露堂，謚文獻，官尚書。先生（安文成）勅建太學，薦公為經史教授，所著《明心寶鑑》行于世。	
2	《東賢號錄》 卷一	露堂秋適，字慣中，秋溪人，麗朝侍中。性豁達，不為檢束，安晦軒裕門人。與先生、茸國學修庠序。所著有《明心寶鑑》。謚文獻，享仁興書院。	
3	《朝鮮歷代名臣錄》之〈金錫奎露伯。……所著篇帙遺失殆盡，獨《明心寶鑑》一篇行堂行狀記〉	秋適，文獻公。字慣中，秋溪人，號露堂。事元宗、忠烈、忠宣，登甲第第一人，官至門下侍中，封密城伯。……所著篇帙遺失殆盡，獨《明心寶鑑》一篇行于世。	
4	許傳（性齋）〈序〉	高麗藝文館提學，門下侍中，文獻公，秋露堂神道碑。……其書有《明心寶鑑》一卷，為目凡十九。	
5	李源祚（凝窩）〈序〉	是書皆古人格言茶飯裘葛，多於行處用力，而曰「明心」何也？心為一身主宰，不明乎心行不著、習不察。此書之所以名也。……秋文獻公，當麗代荒厯之辰，能自明於心，以心為師，于以勗賢館，而崇儒教，述而不作，以遺後人，其視寄耳目而騰口舌者不其賢歟？	
6	趙基升（嘉林）〈序〉	露堂秋公，以麗季理學之宗，被薦於文成安公，重建文廟，斯文賴而不墜，竟做理學之宗主矣。……第其兵燹之餘，文獻無徵，只有《寶鑑》一局，雖是零金片羽，即天地間有數之文字也。	
7	柳疇睦〈序〉	……上年余見案冊有《明心寶鑑》者，竊意其篇目類非閒雜書閱過，所輯錄無非古聖賢勸懲人至論，而分類成書也。愛好而借歸，俾善寫者傳贍為家莊計，恨本未識編輯人名氏。比達南秋君世文奉是書，來請弁，始知露堂文獻公手輯也。」	
8	申佑謨〈跋〉	吾里中有秋姓人，流落羈孤，世業農桑，絕不言譜系、來歷。……而其中別為一書者，曰《明心寶鑑》，寔吾先祖露堂所著也。	
9	李彙載〈跋〉	朱子詩曰：『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此指心而言也。蓋心之體本明，而鑑亦如心，鑑以照物，以心應物。其用一也。露堂秋公《明心寶鑑》一篇，摭取古人格言以備鑑戒，其目十九，其言皆切，皆所以使心不昧，而趨於善也。……	

表二·《秋溪家乘》中有關秋適與《明心寶鑑》關聯之資料			
	出處	原文摘錄	備註
1	李源祚〈序〉	登梓之際，類例不可不歸一，遂合而名之曰秋溪家乘記，其概俾書予卷。空露堂公所編《明心寶鑑》，自爲一書，不入於錄中。	
2	〈秋溪家乘凡例〉第 11 條	文憲公哀輯篇帙，只有《明心寶鑑》，而學者之所共尊閣，故自爲一書。	
3	金錫奎〈行狀〉	公生於高宗丙午，豁達無檢束，素性然也。……所著篇秩遺失殆盡，獨《明心寶鑑》一篇行于世。……	
4	申錫愚纂、金德根書、俞初煥篆〈神道碑銘〉並序	露堂秋先生，諱適，字慣中，高麗忠烈王朝人。……所著有《明心寶鑑》，其學問則曰受學於竹溪先生安煥篆，其官爵則曰忠宣朝召拜門下侍中，封密城伯與食邑，贈諡文憲。……	
5	李敏德〈墓表〉	露堂先生於高麗高宗丙午，元宗庚申文科，調安東書記直史館，遷左司諫，民部尙書致仕。……所著述世遠無徵，有《明心寶鑑》一書行于世，子孫繼世多有名人，而散處四方不能悉記。……	
6	李彙載〈族譜記〉	……蹕路鳴冥得以壇享之班，刊布家乘以補文獻之缺，祖祀得續，祖墓改築，又有《明心寶鑑》一篇，爲露堂所述而並鋟梓行世，秋氏於是乎有聞乎士林。……	
7	柳致好〈題名錄序〉	……於是世文等又復博采東方掌故家諸書，爲《秋溪家乘》三卷，又有露堂先生所撰《明心寶鑑》一卷，又有《秋氏族譜》十一卷，并以付諸刊刻。……	
8	李晚翊〈跋〉	……有孫露堂公，與禹祭酒論易理，又與安文成公結爲道義之交，勸修文廟，興學崇儒，常患心體爲物欲所蔽，乃作《明心寶鑑》書以自警焉。其目凡十九，摭取古聖賢要言格論之有資於存心之功者，裒成一編，其真燭幽之鑑也。……肆惟秋君世文，甫以露堂胄孫，逮我聖上元年倡率諸宗咨籲，蹕路得預於皇壇瞻拜之列，且搜出《明心寶鑑》及《秋溪家乘》，合四卷書，鋟梓印行於世。……	
9	柳致好〈名堂齋記〉	……《寶鑑》一書，乃秋氏家心學旨訣也。要使後人之游習此堂者，常懷敬慕遵奉之心，如魯齋之於小學之書，則其爲慕學也，尊學也者至矣。讀川源有本之訓，體仁人厚重之旨，則如可以想見一堂四賢，學有本末，樹立偉然，而氣像有似矣。至於所謂仁興之稱，乃是因其坊名以揭之者。……	
10	徐贊奎〈闡先題名錄跋〉	余嘗愛露堂秋文憲公《明心寶鑑》，其爲書盡蒐輯前修格言，而蓋出於公平生眷眷服行之餘，觀於安文成舉公爲國學教授，彌可信焉。……	

秋世文是《秋溪家乘》主要的編者，據《秋溪家乘》跋第 7-9 頁秋世文〈跋〉末所屬之「永曆二百十一年丁巳至月上澣二十代孫 世文謹書」推斷，「永曆二百十一年丁巳」當為清·咸豐七年（A.D.1857），也就是說《秋溪家乘》成書之年代最遲當為 A.D.1857 年。再比對上述二表所歸納的《明心寶鑑》與《秋溪家乘》中所錄之〈序〉、〈跋〉資料，可發現二者間之作者有明顯的重出現象，如《明心寶鑑》有：李源祚〈序〉、柳疇睦〈序〉、李彙載〈跋〉、秋世文〈跋〉，《秋溪家乘》有：李源祚〈序〉、柳疇睦〈族譜序〉、李彙載〈族譜記〉、秋世文〈跋〉。除卻秋世文本人外，可見出《明心寶鑑》與《秋溪家乘》所錄之序、跋的作者，有許多重出處，故可推斷今日所見之《明心寶鑑》與《秋溪家乘》應為同一時期刊刻之典籍，非為秋適所處年代之作，二者間極有可能具有承繼抄襲之關聯。回顧前述金錫奎之〈行狀〉「逮我哲憲癸丑，始搜幽宅」之李氏朝鮮哲宗 4 年（A.D.1853），《秋溪家乘》成書之 A.D.1857 年，再參照金錫奎〈行狀〉撰寫的「崇禎紀元後四甲子秋」之 A.D.1864，可推出秋適與《明心寶鑑》之關聯即出現在 A.D.1853 到 A.D.1864 之年代，而無論是《秋溪家乘》的編成或大丘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的付梓刊刻，全都指向秋氏後代子孫秋世文身上，這樣的線索可再求諸於《明心寶鑑》與《秋溪家乘》相關的史料加以印證，至於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中與秋適相關資料之探討，待本文後續再詳加討論。

肆、《秋溪家乘》中相關史料之解疑

筆者據朝鮮總督府警務局寄贈的和刊秋適本《明心寶鑑》¹⁴統計，在該書 19 篇、256 條中，共引用了 19 條《景行錄》的相關資料。《景行錄》為元·史弼編，其生卒年為 A.D.1233-1318，與《高麗史·秋適傳》中提到的秋適之卒年高麗·忠肅王 4 年（A.D.1317）極為接近，又《秋溪家乘》中收錄金錫奎之〈行狀〉中曾提到秋適所處年代之朝鮮為「時程朱書始自中國來，東土人士咸知尊尚而依歸」，¹⁵依此敘述推與年代推斷，在秋適所處程朱理學「始自中國來」且「東土人士咸知尊尚」之時代，朝鮮應不可能立即見到《景行錄》之流傳甚至出現大量的援用之情況，則秋適本《明心寶鑑》中存在之內證，即已無法提供秋適曾編著此書之支持。

此外，詳考《秋溪家乘》中之史料，即可發現秋適編著《明心寶鑑》之說法，實來自於秋適後裔秋世文之手。以下筆者已先行將《秋溪家乘》中與秋世文相關之序、跋、表、記等文章作簡要的年代排序，待溯明年代先後之緒後再行深入討論。

¹⁴ 朝鮮總督府警務局寄贈和刊秋適本《明心寶鑑》，著作兼發行者秋丙九，印刷者朴善奎，日·昭和二年二月二十日發行（A.D.1927）。

¹⁵ 同注 12。

表三·《秋溪家乘》中與秋世文相關之序、跋、表、記排序						
	名稱	原文寫作年代	西元紀年	中國紀年	朝鮮紀年	備註
1	秋世文 〈跋〉	永曆二百十一年丁巳至月	A.D.1857	清·咸豐7年	李氏朝鮮·哲宗8年	永曆是中國南明政權（桂王朱由榔）的年號，永曆元年為1647年，永曆二百十一年為A.D.1857
2	《秋溪家乘》卷之一「世系」	以上凡十一世，自宋紹興辛酉至大明洪武戊申二百二十八年，上五世居東國。自洪武至萬曆壬辰二百二十三年，六世顯中華。自壬辰至今上甲子二百七十三年，子姓復居我東而微不振。	A.D.1864	清·同治3年	李氏朝鮮·高宗元年	宋紹興十一年辛酉（A.D.1141），明洪武元年戊申（A.D.1368），萬曆二十壬辰（A.D.1592），今上甲子（應為清·同治三年，A.D.1864）。據此推斷，此《秋溪家乘》，應編成於清·同治三年（A.D.1864），清·同治三年李氏朝鮮·高宗元年。
3	金錫奎〈行狀〉	崇禎紀元後四甲子秋	A.D.1864	清·同治3年	李氏朝鮮·高宗元年	崇禎元年為A.D.1628，崇禎紀元後四甲子為A.D.1864
4	申錫愚纂、金德根書、俞初煥篆〈神道碑銘並序〉	崇禎紀元後四甲子仲秋	A.D.1864	清·同治3年	李氏朝鮮·高宗元年	
5	秋尙佑 〈跋〉	永曆二百二十年丙寅	A.D.1866	清·同治5年	李氏朝鮮·高宗3年	永曆是中國南明政權（桂王朱由榔）的年

						號，永曆元年為 1647 年，永曆二百二十年為 A.D.1866
6	李敏德〈墓表〉	崇禎紀元後四丙寅八月	A.D.1866	清・同治 5 年	李氏朝鮮・高宗 3 年	崇禎元年為 A.D.1628，崇禎紀元後四丙寅為 A.D.1866
7	李源祚〈序〉	崇禎紀元後四丁卯	A.D.1867	清・同治 6 年	李氏朝鮮・高宗 4 年	崇禎元年為 A.D.1628，崇禎紀元後四丁卯為 A.D.1867
8	朴鳳夏〈序〉	崇禎紀元後四丁卯	A.D.1867	清・同治 6 年	李氏朝鮮・高宗 4 年	
9	南廷夏、柳致潤〈墓碣銘並序〉	崇禎紀元後五戊辰	A.D.1868	清・同治 7 年	李氏朝鮮・高宗 5 年	崇禎元年為 A.D.1628，崇禎紀元後五戊辰為 A.D.1868
10	宋秉一〈族譜序〉	崇禎五戊辰仲秋	A.D.1868	清・同治 7 年	李氏朝鮮・高宗 5 年	
11	柳疇睦〈族譜序〉	上之五年龍集戊辰秋夕	A.D.1868	清・同治 7 年	李氏朝鮮・高宗 5 年	
12	李彙載〈族譜記〉	聖上即祚六年流頭月	A.D.1869	清・同治 8 年	李氏朝鮮・高宗 6 年	「聖上即祚」指的是李氏朝鮮・高宗元年 (A.D.1864)，「六年」為 A.D.1869
13	柳致好〈題名錄序〉	永曆二百二十三年己巳孟冬	A.D.1869	清・同治 8 年	李氏朝鮮・高宗 6 年	永曆是中國南明政權 (桂王朱由榔) 的年號，永曆元年為 1647 年，永曆二百二十三年為 A.D.1869
14	李晚翊〈跋〉	上之六年己巳流月	A.D.1869	清・同治 8 年	李氏朝鮮・高宗 6 年	「上」指的是李氏朝鮮・高宗元年 (A.D.1864)，

						「六年」為 A.D.1869
15	曹克承 〈跋〉	聖上即祚之六年 己巳秋夕節	A.D.1869	清·同治8 年	李氏朝 鮮·高宗6 年	
16	徐贊奎 〈闡 先題名錄 跋〉	崇禎二百四十 三年	A.D.1870	清·同治9 年	李氏朝 鮮·高宗7 年	明·崇禎元年 為 A.D.1628， 崇禎二百四十 三年為 A.D.1870

由【表三】中寫作年代的排序可知，與秋世文相關的各類文章中，以秋世文自撰的《秋溪家乘》之〈跋〉文年代（A.D.1857）最早，且該文亦置於整部《秋溪家乘》的最末。一般而言，「跋」類之文體是置於文章或書籍正文後面的短文，用來說明寫作經過、資料來源等與成書有關的情況，寫作的時間當在該書正文完成之後。據此以推，《秋溪家乘》之內容亦當在秋世文撰寫〈跋〉文之前就已完成。然奇怪的是【表三】所列的其他作者之序、跋、表、記等文，撰寫的年代卻都晚於秋世文之〈跋〉，除不符合編書之常理外，若細究其內容當可發現，其中處處呈現秋世文刻意規劃的意圖。首先，吾人可由時代最切近的金錫奎之〈行狀〉來考察。金錫奎之〈行狀〉云：

……屢經兵燹，並失其衣積之藏，子孫之瞻，掃寓慕久，無其地矣。逮我哲憲癸丑，始搜幽宅，於達城南花園舊地，據失傳不知幾百歲，噫！其異矣。……所著篇秩遺失殆盡，獨《明心寶鑑》一篇行于世。……先生遺孫成沃，陳章上聞，未及竣事，繼而竭誠殫勞，備盡闡發之道，世文是也。同心協贊者曰應齡，曰碩遠、錫九云。¹⁶

秋氏之祖墳在數百年歷經兵燹之後，後世子孫已難尋其址，因此直至「哲憲癸丑」之時始有重新修墳立祠之舉。「哲憲」即為李氏朝鮮之憲宗與哲宗，「癸丑」則為哲宗4年（A.D.1853）。就因為重整修墳立祠之舉，才引發了秋世子孫重新整理《秋溪家乘》的動機。而依金錫奎所述，在重整的過程中陳章上聞、竭誠殫勞、備盡闡發之道，其功勞最大者則為秋世文。此段文字是在秋世文之〈跋〉後，首次提及秋適與《明心寶鑑》之關聯的文章，然依原文的敘述尚看不出金錫奎所據何來。其次，再看申錫愚等人的〈神道碑銘並序〉，其云：

¹⁶同注12，第9-12頁。

……所著有《明心寶鑑》，其學問則曰受學於竹溪先生安裕，其官爵則曰忠宣朝召拜門下侍中，封密城伯與食邑，贈諡文憲。……哲宗癸丑始得其載於大丘府之仁興坊坐午之原，花園後屬大丘故也。子孫於是修塋域、構齋舍以薦芬芳，將豎麗牲之石。公之後孫世文等，來請紀蹟之文于錫愚，辭不獲，遂綴史傳家牒之可徵信者，為文系之以銘。……¹⁷

此段文字除補充了金錫奎〈行狀〉中修墳立祠修塋域、構齋舍、豎麗牲之石之過程外，還印證了其年代確實為哲宗癸丑 4 年 (A.D.1853)。且文中還提到〈神道碑銘〉的撰寫，是由秋世文主動向申錫愚提出的，而〈神道碑銘〉之內容乃是依據秋世文所提供的史傳、家牒為主要訊息來源。據此可推知，申錫愚等人對於秋適著有《明心寶鑑》之認知，亦當由秋世文所提供。接下來再考察秋氏十七代孫秋尙佑的〈跋〉：

山何以有頌，頌焉用記，為所重乎？山者以其有先塋也。……幸賴族孫世文擔夯其事，奔走京鄉，呼籲不止，而有事輒來議，遠近之行未嘗不知，而知之必閱。……¹⁸

〈跋〉文中再次的說明了修墳立祠修塋域、構齋舍的過程，都是賴由秋世文之奔走與呼籲，甚至行事的過程都依靠秋世文來溝通討論。之後李敏德〈墓表〉亦提到：

……所著述世遠無徵，有《明心寶鑑》一書行于世，子孫繼世多有名人，而散處四方不能悉記。來請塋上之文者後孫世文，宅豐而有据有訂，不可以余文為空言，故不辭焉。¹⁹

在此段敘述中雖再次的強調秋適與《明心寶鑑》的關係，但如同申錫愚等人的〈神道碑銘並序〉般，這個撰寫〈墓表〉的舉動還是秋世文主動要求的，而且文中還為秋適與《明心寶鑑》的關聯預留下了「世遠無徵」的伏筆，也就是說在

¹⁷ 見《秋溪家乘》卷之一第 12-14 頁〈神道碑〉，韓國·慶尚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秋溪家乘》四卷，由梧林·金相朝氏於 1996 年 11 月 3 日寄贈。

¹⁸ 見《秋溪家乘》跋第 6-7 頁，韓國·慶尚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秋溪家乘》四卷，由梧林·金相朝氏於 1996 年 11 月 3 日寄贈。

¹⁹ 見《秋溪家乘》卷之一第 14-15 頁〈墓表〉，韓國·慶尚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秋溪家乘》四卷，由梧林·金相朝氏於 1996 年 11 月 3 日寄贈。

李敏德撰寫〈墓表〉的同時，到底《明心寶鑑》是否為秋適所著，都應該尚未有明確的定論，僅能以世遠無徵之說法含糊帶過。接著再看李源祚〈序〉：

……事若有待而理不終泯，如此後孫世文、應齡將衰粹而壽諸梓，要余丁乙遺事碑表及呈褒儒狀墓頌顛末建院事實，隨事隨錄，各成一書，諸名碩所敘述亦隨而異名。登梓之際，類例不可不歸一，遂合而名之曰秋溪家乘記，其概俾書予卷。空露堂公所編《明心寶鑑》，自為一書，不入於錄中。²⁰

「將衰粹而壽諸梓」、「登梓之際」特別指出，李源祚的〈序〉是專為《秋溪家乘》之成書付梓而寫，在其寫序的同時，該書之遺事、碑、表、呈褒、儒狀、墓頌、建院等相關內容皆已完成。李氏之〈序〉未特別指出秋適著有《明心寶鑑》的訊息，並且在隔年 A.D.1868 之時，還專門為《明心寶鑑》留下了〈序〉，若依年代推論，李氏在撰寫《明心寶鑑》之〈序〉前，極有可能已先行瀏覽了《秋溪家乘》中之資料，並影響其對秋適著有《明心寶鑑》之看法。考李源祚之〈序〉作於 A.D.1867 年，距離秋氏子孫於「癸丑」（A.D.1853）重整修墳立祠之時已過了 14 個年頭，距秋世文寫〈跋〉的年代也過了 10 年，然而秋世文秋世文主動提供資料為秋氏立名的舉動卻並未停歇，其舉尚可見於朴鳳夏之〈序〉、南廷夏、柳致潤〈墓碣銘並序〉、宋秉一〈族譜序〉中：

達城秋君世文，以其《家乘》來示余。……逮我聖上元年，世文倡諸宗呼籲蹕路，以洗心公有勳得與於皇壇望拜之列，攷之於秋氏家乘，博採於世之有識者，則何待余萬一之贅辭也。第念一門六人，忠孝俱卓，然可述雖以近世華閥，鮮有能比宜其棹楔之樹風，冠冕之繩武，而若秋氏之懿行高節，掩翳不章。以世文之務積誠意，僅免湮沒而止。揚先美，闡遺芬，竟成其所欲為。……（朴鳳夏之〈序〉）²¹

……公之二十二代孫世文，甫自嶠南來，示余以《家乘》幾編、秋溪合貫記實及皇壇參班之恩誥，蓋其誠意所致，而能事於斯畢矣。宜乎有是祖，有是孫也。於其歸也，又以公碣文見屬。余以淺劣，何敢當是役，顧不忍孤其意，遂據史乘，略撮其要，序次如右，系以銘，銘曰：……（南廷夏、柳致潤〈墓碣銘並序〉）²²

²⁰ 見〈秋溪家乘序〉第 16 至 19 頁，韓國·慶尚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秋溪家乘》四卷，由梧林·金相朝氏於 1996 年 11 月 3 日寄贈。

²¹ 同注 20，〈秋溪家乘序〉第 19 至 23 頁。

²² 見《秋溪家乘》卷之一「墓碣」第 3 頁，韓國·慶尚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秋溪家乘》四卷，由梧林·金相朝氏於 1996 年 11 月 3 日寄贈。

秋士世文、閻永，甫袖其家乘訪余於寂寞之濱，先陳世德，以其譜乘要我弁卷之文，一門七賢，實德崑勳，垂諸竹帛。申尚書伯仲之纂述已備，故不必贅陳，更添日下之燁也明矣。……（宋秉一〈族譜序〉）

23

「逮我聖上元年」，指的是李氏朝鮮·高宗元年（A.D.1864），也是《秋溪家乘》卷之一「世系」、金錫奎〈行狀〉及申錫愚等人〈神道碑銘並序〉完成的年代。由「以其《家乘》來示余」、「示余以《家乘》幾編、秋溪合貫記實及皇壇參班之恩誥」、「秋士世文、閻永，甫袖其家乘訪余於寂寞之濱，先陳世德，以其譜乘要我弁卷之文」幾段文字可見出，直至此時秋世文以其《家乘》廣示眾人的舉動尚持續進行著，名義上是「攷之於秋氏家乘，博採於世之有識者」，以「務積誠意」之努力，避免秋氏諸賢事蹟湮沒於世，實質上卻是藉當世有識者為《家乘》寫序跋的過程，替已世遠無徵的秋氏家族作立名之舉，這樣的看法在柳疇睦〈族譜序〉中就特別凸顯：

……因各收單，摠成一譜，共十一卷，鳩財竭力，用活字印出於達城之仁興祠。二十二代孫世文與光雲、浩奎，奉譜冊北來謁弁文，余不文，何以穢諸首。辭不獲。竊惟夫人家譜牒之炤耀人耳目，或以冠冕赫世，或以勳戚顯閥則有之，豈若秋氏中國而東國，麗朝而我朝，世其名卿，而德義學問為其基本，忠孝勳烈為其標準者，罕其倫乎。……

24

此段文字除了陳述秋氏後代鳩財竭力完成家乘並以活字大量印刷刊行外，依然可見到秋世文等人「奉譜冊北來謁弁文」的紀錄，以《家乘》廣示眾人、為秋氏立名之舉，如實的都被保留下來。柳疇睦認為，一般人家編纂家譜之目的無非是「炤耀人耳目」、「冠冕赫世」、「勳戚顯閥」，而秋氏所編之《家乘》卻是以「德義學問為其基本」、「忠孝勳烈為其標準」，其實這不過是美讚之詞，綜觀《秋溪家乘》中相關之序、跋、表、記、遺事、碑銘、參軍記、告祭文、受教、通文、呈文等等內容，皆不免於「炤耀人耳目」、「冠冕赫世」、「勳戚顯閥」之功，其目的皆在溯源上特別凸顯於秋適以下的「一門七賢」之勳業。

先談秋氏在理學之「德義學問」上的表現，據《家乘》所錄諸家之序跋中可見的有：金錫奎〈行狀〉、申錫愚等人之〈神道碑銘〉、李敏德〈墓表〉、柳疇

²³ 見《秋溪家乘》卷之四第 19-20 頁〈族譜序〉，韓國·慶尙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秋溪家乘》四卷，由梧林·金相朝氏於 1996 年 11 月 3 日寄贈。

²⁴ 見《秋溪家乘》卷之四第 20-22 頁〈族譜序〉，韓國·慶尙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秋溪家乘》四卷，由梧林·金相朝氏於 1996 年 11 月 3 日寄贈。

睦〈族譜序〉、李源祚〈序〉、朴鳳夏〈序〉、李彙載〈族譜記〉、李晚翊〈跋〉等，這些內容除了強調秋篁、秋適在理學上的成就外，還特別將秋適與朝鮮理學大師安文成修文廟、茸國學、建庠序的作為呈現出來，其中最完整的敘述為金錫奎之〈行狀〉：

麗朝理學宗師，有露堂先生，姓秋，諱適，字貫中，露堂其號也。……考諱篁，號悔庵，官至藝文館大提學門下侍中，諡文正，首倡理學，為世標準。公生於高宗丙午，豁達無檢束，素性然也。文章夙就，踐履篤實，與禹祭酒倬，嘗討論易學。元宗庚申登文科，調安東書記選直史館，遷左司諫，因闖人黃石良陞縣合德，不署，事下有司，械囚巡馬。所押者請由徑行，公據理責之，遵通衢詣獄，天以彗星警之，尋復舊官。歷民部尚書、藝文館大提學。時國家多事，伐叛耽羅，問罪東倭，屢十年干戈搶攘，文學幾乎掃地。安文成公裕茸國學，修庠序，薦公為經理教授，令禁內學館內侍三都監、五庫、七管、十二徒諸生，皆從而學習，橫經受業者動以數百計，黌舍殆不能容，皆以通經博古為事，儒風始大振矣。²⁵

其次再談到秋氏家族「一門七賢」之勳業事蹟。「一門七賢」之謂，在宋秉一〈族譜序〉中之敘述已曾談到：

……秋士世文、閻永，甫袖其家乘訪余於寂寞之濱，先陳世德，以其譜乘要我弁卷之文，一門七賢，實德崑勳，垂諸竹帛。……²⁶

「甫袖其家乘訪余於寂寞之濱，先陳世德，以其譜乘要我弁卷之文」一段，又是秋世文請序之明證。「一門七賢」，依據《家乘》中各種資料顯示，除了秋適之外，其他六人應為萬曆年間參與朝鮮戰役的秋水鏡與其五子之「六賢」。²⁷在《家乘》中記載「六賢」事蹟的計有：《秋溪家乘》卷之一「世系」中之「十

²⁵同注 16。

²⁶宋秉一的〈族譜序〉，見《秋溪家乘》卷之四第 19-20 頁〈族譜序〉，韓國·慶尚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秋溪家乘》四卷，由梧林·金相朝氏於 1996 年 11 月 3 日寄贈。

²⁷「六賢」之說，可見於《秋溪家乘》中朴鳳夏〈序〉及李晚翊〈跋〉。朴鳳夏之〈序〉云：「萬曆壬辰，以武康刺史承命東援，屢破倭于西，于南竟卒，于軍禮葬其全州地，是贈完山府院君，號洗心堂，諱水鏡也。蘆、荻、菊、芝、蘭，寔洗心堂五子，而或隨公於東來之初，或隸於麻提督軍，俱會于稷山雷城，世所稱秋氏六賢是耳。」李晚翊之〈跋〉云：「繼以有洗心堂以武康刺史，萬曆壬辰承命東援，屢破倭寇，奮敵愾於戎馬矢石之間。我朝忠勳偉烈，無愧為李忠武、郭忘憂之列矣。有五子，諱蘆、荻、菊、芝、蘭，隨公於東來之初，從麻提督奮擊稷山雷城之賊，世所稱秋氏六賢，是已第恨。」

世諱「水鏡」、金錫奎〈行狀〉、申錫愚等人之〈神道碑銘〉、李源祚〈序〉、朴鳳夏〈序〉、柳疇睦〈族譜序〉、李彙載〈族譜記〉及李晚翊〈跋〉等，其中以金錫奎〈行狀〉與李彙載〈族譜記〉的敘述最為詳盡：

萬曆壬辰，水鏡為提督李如松摠兵亞將，率二子文科按察使蘆與庠生荻，奉皇詔東援征倭寇，屢奏捷。嘗以詩遺五子曰：「故明山川夢外春，東方風物幾回新，莫言富貴千秋事，只願孝忠一代臣。」此可見戒飭深切也。逮至庚子還次全州府，以身殉軍中。宣祖特加恩遇，以禮葬，兩致祭焉。追贈完山府院君。蘆後除檢詳舍人，不就。曰菊，文科永安守。曰芝、曰蘭，具登庠生。後隨都督麻貴而來，協謀討賊，多有戰功。即遭難，昆弟五人守墓於全州萬德山。誠孝所格，感應物類，白鵲棲楸，彪虎護廬，桃李不華，終三年如一日，至今為遺民之指點愛慕焉。（金錫奎〈行狀〉）²⁸

至諱水鏡，萬曆壬辰以武康刺使隨李提督如松，奉皇詔東援，大鏖於平壤，轉鬪千里，每戰必捷，有子五人，曰蘆，曰荻，曰菊，曰芝，曰蘭，生於中國，二子隨父同來，効死捍衛，三子恨不得從行。丁酉從提督麻貴，會公於稷山，奮擊賊大破之，時稱秋氏六父子。還次全州，公卒于軍。上大加驚悼，賜以禮葬，贈完山府院君，五子守墓於全州以終三年。（李彙載〈族譜記〉）²⁹

這兩段文字中都分別提到了李如松與麻貴兩位提督，期時代則分別為萬曆壬辰年與丁酉年，這背後所發生的史事實為萬曆年間所發生的東援朝鮮之役。明·萬曆 20 年（A.D.1592），即朝鮮·李朝宣祖 25 年（壬辰年），日本關白豐臣秀吉經過長期的備戰，親率水路大軍，悍然發動了對朝鮮的侵略戰爭，史稱「萬曆朝鮮之役」，朝鮮稱之為「壬辰戰爭」或「壬辰倭亂」。當時朝鮮疏於軍備，豐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率軍從對馬攻佔朝鮮釜山，又渡臨津江，日軍很快攻下王京（漢城）、開城、平壤等地，宣祖李昞奔平壤、後又奔義州，朝鮮八道幾乎全部淪陷。在國家危急之際，宣祖多次向明朝求援，明朝應朝鮮之請，出兵援朝抗倭。萬曆 20 年 12 月，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略使，李如松奉命為東征提督，率四萬三千餘兵渡鴨綠江，相繼收復王京、開城等地。萬曆 21 年（A.D.1593）3 月，日軍要求議和，明遂派出遊擊將軍沈惟敬與日方小西行長議和，促成了暫時的和平。明朝乃命李如松班師，留劉鋹之兵在朝鮮駐守。李如松於該年十二月班師，加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萬曆 25 年（A.D.1597）調任遼東總兵。就

²⁸ 同注 16。

²⁹ 見《秋溪家乘》卷之四第 22-24 頁〈族譜序〉，韓國·慶尙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秋溪家乘》四卷，由梧林·金相朝氏於 1996 年 11 月 3 日寄贈。

在這一年，日寇再次發動侵朝戰爭，此年為丁酉年，故稱「丁酉之役」。萬曆 26 年 2 月，明朝再次出兵援救朝鮮，麻貴以提督之職帶領李如松之弟李如梅等將領，分四路援朝，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分道向釜山挺進，陳璘與朝鮮水軍將領李舜臣緊密配合，在海上打敗敵人最精銳的小西行長所部，八月，豐臣秀吉死，日軍撤兵，中朝聯軍乘勢進擊，日軍大敗。同年十一月，戰爭基本結束。隔年三月，旋師。麻貴，晉封為右都督。這兩次戰爭，日本史家分別將其稱為文祿、長慶之役。整段「壬辰倭亂」到「丁酉之役」之過程，詳見於《明史》〈李成梁傳〉、〈神宗本紀〉、朝鮮《宣祖昭敬大王實錄》、朝鮮《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實錄》及日本相關史料之中。戰後，明朝東援將士有不少人落籍朝鮮，援朝將士的子孫也有陸續東渡朝鮮者，而《秋溪家乘》各類文章中所言秋水鏡與其五子之事蹟，所指的時代背景應即為此段戰役。「壬辰倭亂」與「丁酉之役」的整個過程，被史傳詳細的紀錄下來，雖然《秋溪家乘》中大量的讚頌秋水鏡與其五子在朝鮮戰役中的功勳，然而諸如「水鏡為提督李如松摠兵亞將，率二子文科按察使蘆與庠生荻，奉皇詔東援征倭寇」、「水鏡，萬曆壬辰以武康刺使隨李提督如松，奉皇詔東援」或秋菊等兄弟「後隨都督麻貴而來，協謀討賊，多有戰功」、「丁酉從提督麻貴，會公於稷山，奮擊賊大破之」的陳述，卻未見於當時的《明史》、《朝鮮·宣祖昭敬實錄》或日本的史料紀錄之中，就連「萬曆十九年辛卯出為武康刺史」、「追贈完山府院君」、「除檢詳舍人」這樣的大事，亦未見於當時的正史紀錄，而在秋水鏡死後的兩百五十幾年後，³⁰這些事蹟卻被大量的傳頌，在於史無徵之情況下不得不又起人疑竇，就連〈秋溪家乘凡例〉中都會明言：「東援懿蹟，盡失於干戈之中，只就國史與勳錄所載者略陳顛末。」又如「除檢詳舍人」之語中，「檢詳」與「舍人」在李氏朝鮮的「議政府」中各分屬不同的職務，舍人是正四品，檢詳為正五品，一般不會有「除檢詳舍人」的情況出現。《家乘》資料中所言，秋水鏡於萬曆 19 年時任「武康刺史」，明·萬曆時期，武康屬於湖州府所管轄的一個縣，並無刺史之職。刺史原為漢武帝時所設，唐代改郡為州，以太守為刺史。至宋時以朝臣出知府州，刺史成為專供武臣遷轉的虛銜，任者並不赴任。元以後刺史之名廢。明興不因元制，遙承兩宋，普設知府知州知縣之屬，清人用作知州的別稱。以歷代職官演變來看，「萬曆十九年辛卯出為武康刺史」的敘述，實與當時史實與職官體系不符。在近人王秋華〈明萬曆援朝將士與韓國姓氏〉的研究中，對於秋水鏡與其五子的討論，亦僅能援引進代韓人所編纂之《韓國人的姓譜》之資料為證，難能就當時史料得

³⁰ 據《秋溪家乘》卷之一「世系」載，秋水鏡之卒年為萬曆二十八年（宣祖三十三年，A.D.1600）庚子九月九日，而秋世文在《秋溪家乘》中撰寫〈跋〉文之時間為「永曆二百十一年丁巳」（A.D.1857），二者差距至少有 257 年。此外，今日可見最早有關秋水鏡的〈明副摠兵贈完山府院君洗心堂秋公神道碑〉，為朝鮮人金福漢於「三百二十三年」後所撰，時代更晚於《秋溪

到徵實。³¹此外，依據《秋溪家乘》之內容，秋氏第五世孫秋濡，還有一段與明太祖相遇於金山寺並助其創建王朝的敘述。《秋溪家乘》卷之一「世系」記載：

五世諱 濡。字潤之，號雲心齋，高麗忠穆王元年乙酉生，恭愍王十一年壬寅進士，參 大明勦業功臣，官至戶部尚書，永樂二年甲申卒。

32

且在《家乘》中金錫奎〈行狀〉、申錫愚等人之〈神道碑銘〉、朴鳳夏〈序〉、柳疇睦〈族譜序〉、李彙載〈族譜記〉及李晚翊〈跋〉等文章，都可見到相關的敘述，其中又以金錫奎〈行狀〉最為詳盡：

孫濡，號雲心齋，年十八中進士，時元祚日衰，鋤耰棘矜，乘便蜂起，公仰觀乾象，參以人事，洞知曆數之當變，放浪至金山寺。遇大明太祖，風期暗襯，宛如太公之渭濱、臥龍之南陽也。太祖有詩曰：「九五飛龍自有時」，公繼吟曰：「三千大地一鞭收」，其心會默契類如是矣。杖劍從濠州起，與誠意伯同心協贊，以定大策，官至戶部尚書，再以慰諭使杖命朝鮮，以宣安戢，効忠於父母之國，事在我太祖、太宗時也。³³

秋濡為「大明勦業功臣，官至戶部尚書」，這是何等顯赫之事蹟，然在正史中卻找不到任何紀錄。尤其是秋濡遇太祖於金山寺所唱和之詩，更無法在典籍中得到徵實，且以戶部侍郎為慰諭使杖命朝鮮之事蹟，亦難以得到印證，其次是秋水鏡及其五子援朝參戰之事蹟，亦無法在當時中、朝、日之正史中找到相關之資料。就連〈秋溪家乘凡例〉中都曾明言：「中葉六世仕宦於天朝，文獻無徵，故不敢列敘。」綜合上述〈序〉、〈跋〉等相關資料與史實之討論，在在都可見出秋世文等人特為秋氏先輩「炤耀人耳目」、「冠冕赫世」、「勳戚顯閥」之操作痕跡，甚至秋氏先輩封官列爵之舉，都可能為秋世文上表李氏朝鮮後所產生，也就是說李氏朝鮮對秋氏歷代官職之認定，亦可能即出自於出秋世文推動之下的結果。據金錫奎之〈行狀〉所云：「逮我哲憲癸丑，始搜幽宅，於達城南花園舊地。」秋氏之祖墳在數百年歷經兵燹之後，後世子孫以難尋其址，因此直至「哲憲癸丑」

家乘》中所錄之資料。詳見 http://gsm.nricp.go.kr/_third/user/search/KBD007.jsp?ksmno=3746，2009年12月25日查閱。

³¹ 見王秋華，〈明萬曆援朝將士與韓國姓氏〉，《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6月第14卷第2期，頁122-123。

³² 見《秋溪家乘》卷之一「世系」，頁2。韓國·慶尚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秋溪家乘》四卷，由梧林·金相朝氏於1996年11月3日寄贈。

³³ 同注16。

之時始有重新修墳立祠之舉。「哲憲」即為李氏朝鮮之憲宗與哲宗，「癸丑」則為哲宗 4 年（A.D.1853）。就因為秋世文推動了重整修墳立祠之舉，才引發了其後重新整理《秋溪家乘》的動機。有關秋世文影響李氏朝鮮對秋氏歷代官職之認定的推論，還可再證諸於《秋溪家乘》卷之四中所錄之「呈文」的相關資訊。

	名稱	作者	年代	西元紀年	備註
1	四道儒呈春曹文	參判金萬根○慶尙道、全羅道、忠清道、平安道	丙辰三月日	1856	
2	大丘儒呈本府文	判官朴承圭	丁巳九月日	1857	
3	嶺南儒呈巡營文	監司趙乘駿	丁巳九月十八日	1857	
4	嶺南儒呈左繡衣文	御史應準	丁巳九月二十七日	1857	
5	嶺南儒呈又繡衣文	御史徐相至	丁巳十一月三日	1857	
6	嶺南儒再呈左繡衣文	御史同上（徐相至）	丁巳十二月四日	1857	
7	嶺南儒再呈右繡衣文	御史同上（徐相至）	丁巳十二月十二日	1857	
8	嶺南儒三呈右繡衣文	御史同上（徐相至）	丁巳十二月二十七日	1857	
9	大丘鄉校稟本府文	判官金炳愚	辛酉十月二十一日	1861	
10	嶺南儒呈巡營文	監司徐憲淳	癸亥五月二十八日	1863	
11	大丘鄉校稟兼府文	柒谷府使李奎興	甲子正月二十日	1864	
12	四道儒呈春曹文	判書全應均○道號見上	乙丑三月二十一日	1865	

呈文，是下級機關呈送上級機關的文書，屬於上行文書。據金錫奎〈行狀〉中「先生遺孫成沃陳章上聞，未及竣事，繼而竭誠殫勞，備盡闡發之道，世文是也。」所述，秋氏子孫在秋成沃時便已開始將先輩之功勳事蹟陳章上聞於朝廷，而真正竭誠殫勞繼之成事者則為秋世文。在【表四·《秋溪家乘》中〈呈文〉年代簡表】中羅列了十二篇原文中已標明年代的〈呈文〉之相關資訊，年代分別由 A.D. 1856-1865 年，而秋世文推動的重整修墳立祠之舉則發生在 A.D.1853 年，其所撰之〈跋〉文則在 A.D.1857 年，而所有〈呈文〉的撰寫年代都在秋世文推

動的重整修墳立祠之後，且〈呈文〉對秋氏家族「一門七賢」之勳業事蹟的描述，亦幾乎都與前列〈序〉、〈跋〉、〈墓表〉、〈行狀〉、〈記〉等之內容相同，可明顯的推出其應有共同之來源，若再回證於柳致好〈題名錄序〉中完整的敘述秋世文請序之過程，則大抵可推知秋世文戮力於闡揚秋氏先輩之用心，柳致好〈題名錄序〉云：

……迺者肖孫世文與碩遠、漢奎諸人，深懼潛光之未闡，家聲之永墜，相率而籲於朝。朝廷嘉其蹟，使其子孫特參皇壇之拜，而秋氏衣冠遂復顯于世矣。於是世文等又復博采東方掌故家諸書，為《秋溪家乘》三卷，又有露堂先生所撰《明心寶鑑》一卷，又有《秋氏族譜》十一卷，并以付諸刊刻。氏又以其序、跋、附錄撰述諸家，上自廟堂縉紳，下至鄉野韋布，皆極一時之重望，不可以不別例遵閣，乃復抄錄其官啣姓名為一卷，名其卷曰「秋氏闡先題名錄」，付之其後，役於新寧之白鶴山下。余幸邂逅其所留，止數日，始與秋君世文識，世文誠端雅士，而終始幹其事者也，其伯着永文亦難兄也。……世文甫示余以「題名錄」，請弁其卷。……³⁴

柳致好的〈題名錄序〉作於「永曆二百二十三年己巳孟冬」，永曆是中國南明政權（桂王朱由榔）的年號，永曆元年為 A.D.1647 年，永曆二百二十三年己巳即為 A.D.1869。在《家乘》所錄序、跋等相關資料中亦有幾篇署名「己巳」年之作品，如：《秋溪家乘》跋第 4-8 頁李晚翊〈跋〉末所屬之「上之六年己巳流月」、《秋溪家乘》跋第 1-3 頁曹克承〈跋〉末所屬之「聖上即祚之六年己巳秋夕節」。據《秋溪家乘》跋第 7-9 頁秋世文〈跋〉末所屬之「永曆二百十一年丁巳至月上澣二十代孫 世文謹書」推斷，「永曆二百十一年丁巳」當為清·咸豐七年（A.D.1857），則秋世文〈跋〉寫作的年代，將早於其他諸人撰寫《序》、《跋》之年代，也就是說較 A.D.1857 後出之文章，極有可能皆是依秋世文所述之內容輾轉抄錄繕寫的。在柳致好的〈題名錄序〉中不但可見出秋世文編纂《家乘》與請序之完整過程，同時還出示了《秋溪家乘》、《明心寶鑑》、《秋氏族譜》三種典籍，並且將「序、跋、附錄撰述諸家」的資料一併附上，就因柳氏「邂逅其所留，止數日，始與秋君世文識」之因由，秋世文即積極主動的邀請其為〈題名錄〉作序。由這段文字的內容反推於前文【表二·《秋溪家乘》中有關秋適與《明心寶鑑》關聯之資料】中所羅列之資料，則可見出秋世文積極主動建構《秋溪家乘》與秋適之關聯，再由此關聯落實到秋適編著《明心寶鑑》之線索上，這

³⁴ 柳致好〈題名錄序〉，見《秋溪家乘》卷之四第 26-28 頁〈族譜跋〉。韓國·慶尙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秋溪家乘》四卷，由梧林·金相朝氏於 1996 年 11 月 3 日寄贈。

一系列的作為，使得秋適為《明心寶鑑》編者之論點被確認下來，這樣的推論亦剛好可由本文前述【表一·《國譯增補明心寶鑑》中有關秋適與《明心寶鑑》關聯之資料】中所呈現的情況得到印證。吾人若仔細比對大丘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所錄之〈序〉、〈跋〉與《秋溪家乘》所錄之〈序〉、〈跋〉中重出之作者，則可再次印證二者間所呈現承繼抄襲之關聯。大丘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之〈序〉、〈跋〉有：李源祚〈序〉、柳疇睦〈序〉、李彙載〈跋〉、秋世文〈跋〉；《秋溪家乘》之〈序〉、〈跋〉有：李源祚〈序〉、柳疇睦〈族譜序〉、李彙載〈族譜記〉、秋世文〈跋〉。除卻秋世文本人外，可見出《明心寶鑑》與《秋溪家乘》所錄之序、跋的作者，有許多重出處，故可推斷今日所見之大丘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與《秋溪家乘》應為同一時期刊刻之作品，非為秋適所處年代之作。二者極有可能都同出於秋世文之手，且將《明心寶鑑》一書冠上了秋適之名，這點在柳致好〈題名錄序〉中「為《秋溪家乘》三卷，又有露堂先生所撰《明心寶鑑》一卷，又有《秋氏族譜》十一卷，并以付諸刊刻。」之敘述裡，已得到明確之證實。

考之《秋溪家乘》所錄之遺事、輯錄、告祭文、參軍記、受教、合貫文、立宗文等等資料所述，未曾見出於秋世文所處年代之前有任何秋適著述《明心寶鑑》之訊息，而到了秋世文所處之年代，秋適著述《明心寶鑑》之說卻憑空成爲了確切之看法，在詳細比對《秋溪家乘》與《明心寶鑑》所錄之資料後，更可推斷這一切極可能都是源自於秋世文之手。

伍、《明心寶鑑》相關史料之解疑

有關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中與秋適相關之資料，本文已於前述【表一·《國譯增補明心寶鑑》中有關秋適與《明心寶鑑》關聯之資料】中作了簡要的歸納，而在大丘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中，則錄有與秋適相關的五篇〈序〉與四篇〈跋〉，³⁵其作者與寫作年代分別如下：

序

- 1、李珥（栗谷）序：嘉靖庚戌三月念後德水李珥（A.D.1536-1584）字叔獻謹序。（嘉靖庚戌，明·嘉靖29年，李朝·明宗五年，A.D.1550）
- 2、許傳（性齋）序：聖上御極之三年丙寅五月小暑節，通正大夫行金海都護府使孔巖許傳謹序。（聖上御極之三年丙寅，清·同治七年，李朝·高宗三年，A.D.1866）

³⁵見韓·秋適著，金鍾國譯，《國譯增補明心寶鑑》，韓國·成均館大學校，檀紀4292（1959）年，頁197-215。

- 3、李源祚（凝窩）序：崇禎後五戊辰仲春，晚歸山人凝窩李源祚謹書。（崇禎後五戊辰，清·同治七年，李朝·高宗五年，A.D.1868）
- 4、趙基升（嘉林）序：戊辰棗秋之上幹，通正大夫前行敦寧都正，嘉林趙基升謹序。（戊辰，清·同治七年，李朝·高宗五年，A.D.1868）
- 5、柳疇睦序：上之五年戊辰重陽前一日，通訓大夫前行公清道都事，豐山柳籌睦謹序。（上之五年戊辰，清·同治七年，李朝·高宗五年，A.D.1868）

跋

- 1、李珥（栗谷）跋：嘉靖庚戌三月 日，德水李珥叔獻謹跋。（嘉靖庚戌，明·嘉靖 29 年，李朝·明宗五年，A.D.1550）
- 2、申佐謨跋：聖上即阼之六年己巳端月夏至後三日，嘉善大夫前行兵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義禁府事 五衛都摠府副摠管 靈川申佐模（1799-1877）謹跋。（聖上即阼之六年己巳，清·同治八年，李朝高宗六年，A.D.1869）³⁶
- 3、李彙載跋：上之六年己巳夏，通政大夫前行戶曹參議，真城李彙載跋。（上之六年己巳，清·同治八年，李朝高宗六年，A.D.1869）
- 4、秋世文跋：今去我 先祖文憲公露堂先生五百有四十餘歲。（1317³⁷+540=A.D.1857，清咸豐七年，李朝·哲宗八年）

上列〈序〉、〈跋〉中以框線標示者為原文中之年代，各條之後以括號標示者，為筆者查詢換算之年代。〈序〉、〈跋〉中，年代最久者為李珥（栗谷），茲將其原文轉錄於下：

李珥（栗谷）序

《明心寶鑑》何為而作也？古之人憂後學之循利忘義而作也。蓋人之生，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命之性則道心之謂也，氣質之性則人心之謂也。道心者仁義理智性命之正，人心者知覺運動形氣之私。行其正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循其私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然人心惟微，道心惟微，必察於二者之間，而惟精惟一，使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擴充而為一身之主，口鼻耳目四肢百體之欲禁止而每

³⁶ 《國譯增補明心寶鑑》附錄之標題原作「申佑謨跋」，文末則署名「靈川申佐模謹跋」，考諸《韓國人族譜》附錄〈譜學〉所附之「年表」，符合秋世文興建仁興書院的朝鮮純祖 25 年（1825）前後出生的申氏名人，僅有朝鮮正祖 23 年（1799）出生、朝鮮高宗 14 年（1877）卒的申佐模，故特據此而更正為「申佐模跋」。《韓國人族譜》，韓國人族譜編纂委員會，韓國·日新閣圖書，1982 年 11 月，〈譜學〉第 321 頁、330 頁。

³⁷ 據《秋溪家乘》卷之一「世系」記載：「三世諱 適。……忠肅王四年丁巳七月七日卒。」忠肅王丁巳，為高麗·忠肅王 4 年，A.D.1317 年。

聽命於己，則危者安，微者著，而本心之明無不明矣。是以中庸之率性、大學之明德皆其意也。今看是書，其所言雜引諸儒之說，文理語脈不似庸學之貫通相接，然其所以為教者又皆本之天命所賦渾然之理，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節節提斯，句句警覺，使人去惡而就善，遵義而忘利，此篇之作豈偶然哉？今有人把鑑照身，見其容貌之不正，則必之其惡而正之者矣。看此一篇，反求諸身而省心修己，亦如窺鑑照面，如知所以改其容，則庶乎其得此名篇之義，而不失其心之正矣。嘉靖庚戌三月念後德水李珥字叔獻謹序。³⁸

李珥（栗谷）跋

去年冬，家君自嶺南歸，手持《明心寶鑑》一卷，其中所載數百餘言，皆勸善懲惡之說也。余再三披讀，未嘗不付臂而歎也。蓋先賢之嘉言格說，雜出於傳記者何限？未有若此之辭約而意備者也。其《明心寶鑑》之名，豈偶然哉？若使學者覽此善言而興起焉，急滌其既染之異而濯其未垢之污也。世之欲明其心者，捨是書而何以哉？若其潛心而玩索焉，則可使人人感發其好善惡惡之心，而未必無小補也。故如是乎言，以付其後。嘉靖庚戌三月 日，德水李珥叔獻謹跋。³⁹

李珥的序、跋皆撰於嘉靖庚戌年，也就是明·嘉靖 29 年（李朝明宗五年，A.D.1550），朝鮮的文士以明朝的帝號紀年可見當時漢文化對其影響性。除此之外，李源祚亦以崇禎後五戊辰紀年，此時已是清·同治七年，大清帝國在中國已統治超過兩百年的歷史，但李源祚依然已明帝年號紀年，亦可見出明代文化在朝鮮的深植程度。由〈序〉文中「天命之性」、「氣質之性」、「道心」「人心」、「人心惟微，道心惟微」、「中庸之率性、大學之明德」、「天命所賦渾然之理」等思路可看出，李珥的問學方向深受程朱理學的影響。〈序〉中倡言天理人性、道心人心之別，在循理擴充道心以言本心之明下，率性、明德以回應於天命所賦渾然之理。〈序〉、〈跋〉中「把鑑照身」、「反求諸身而省心修己」、「而不失其心之正」、「使學者覽此善言而興起焉，急滌其既染之異而濯其未垢之污也」、「使人人感發其好善惡惡之心」諸語，將《明心寶鑑》一書之主旨說得極為透徹，可謂相當切合編纂主旨的佳作。將李珥的〈序〉、〈跋〉置於卷前，足見秋氏家族對其推崇的程度。然由上引文中卻又可看出些許的問題，首先是〈序〉、〈跋〉中雖確切的點出《明心寶鑑》的主旨，但卻未曾提及該書之編纂與作者問題，極可能李珥當時就不確知此書的作者為何人，不然為一書作序怎可能不提及作者？其次，在〈跋〉中道出了此書的來源為「家君自嶺南歸，手持《明心寶鑑》一卷」。

³⁸ 同注 35，頁 198-199。

³⁹ 同注 35，頁 209。

「嶺南」，在李氏朝鮮時代的行政區，大概相當於當時的慶尙道。李珥出生於江陵（江原道），13 歲即考中進士初試，直到 19 歲時才離家進金剛山。依據〈序〉、〈跋〉標示之年代，李珥為大丘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寫序、跋時為 14 歲，此時尚居於江原道，而江原道在大丘所屬之慶尙道的北方，因此李珥〈跋〉中說「家君自嶺南歸，手持《明心寶鑑》一卷」，其書之來源是有可能來自於南方的大丘。但值得玩味的是，文中完全見不到《明心寶鑑》與秋適間之關聯，且在寫作此二文時李珥尚未成年。依李珥的生年換算，寫作〈序〉、〈跋〉的當時他才方滿 14 歲，⁴⁰而〈序〉文的末句李珥卻是以「字叔獻」的方式署名，對於一個碩儒來說這是不符合身分與禮制的作法。自周朝制定禮制始，凡人年幼時僅稱其名，至行過成年的冠禮後方始稱字，過了 50 歲後才能依其家族排行以伯、仲、叔、季來稱呼，⁴¹這樣的傳統在中國社會中一直被傳承下來，甚至遠及所有受漢文化圈影響的國家。若回溯於〈序〉、〈跋〉的內容來看，李珥的確問學用心且能在清晰的思路寫下文辭並茂之文章，有這樣學養之人會犯下如此違禮之錯誤，頗令人費解。此外據其生平來看，李珥出生於江陵（江原道），13 歲即考中進士初試，19 歲時才離家進金剛山，鑽研佛教，號稱「義庵」。經一年研究，終於悟到「佛釋是邪學」，於是回到江陵家中，「復取聖賢書」，專心鑽研儒學。23 歲時，拜訪聞名全國的朝鮮朱子學集大成者李滉（退溪，A.D.1501-1570），請教主敬、格物、存養等問題，其後提出「理氣二元」論的宇宙觀，成為李朝前期重要的朱子學家。若依時間換算，寫作〈序〉的當時他才僅是方考中進士初試的 14 歲少年，距其 23 歲拜於朝鮮朱子學者李滉之門的時間尚遠。又以一個方滿 14 歲的年少幼儒，能寫出如此富有深度學養的文章，且能據理學「天命之性」、「氣質之性」析論，這樣的著作三百年來不但未在李珥的文集中出現，甚至亦未聞於任何學者提及或徵引，尤其是在宋明理學大興的朝鮮時期，亦皆未見諸文獻之中。一篇未見於世或其他《明心寶鑑》刊本之中的〈序〉文，卻能在三百多年後秋家後代的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中突然出現，更難令人置信。無怪乎李彙載在〈跋〉中就會有「不入於公之全書中，則此必少時作也」的推測，但這樣的推測還是無法自圓於〈序〉中違禮冠字的錯誤。此外在前引朝鮮·鄭麟趾等纂修《高麗史》卷一百六之〈秋適傳〉中，也未見到秋適與《明心寶鑑》相關之敘述。

⁴⁰ 據《韓國人族譜》附錄〈譜學〉所附之「年表」所示，李珥生於朝鮮中宗 31 年（1536），卒於宣祖 17 年（1584），而〈序〉〈跋〉皆明確標示為嘉靖庚戌（明·嘉靖 29 年，李朝明宗五年，A.D.1550）所作，換算一下年代，李珥當時英方滿十四歲。見《韓國人族譜》，韓國人族譜編纂委員會，韓國·日新閣圖書，1982 年 11 月，〈譜學〉第 295 頁、300 頁。

⁴¹ 據《禮記·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孔穎達《正義》謂：「幼名、冠字者，名以名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諡。」在禮制中年滿二十弱冠之後才冠上字，十四歲的

鄭麟趾是 A.D.1396-1478 時人，號學易齋，是李氏朝鮮初期的文臣及著名的理學家，所編之《高麗史》主要為記述高麗王朝的歷史。自李朝世宗 31 年 (A.D.1449) 起，鄭麟趾、金宗瑞等便奉旨開始編撰史書，於文宗元年 (A.D.1451) 完成修纂。在鄭麟趾編纂《高麗史》「纂修高麗史凡例」的「列傳」條下云：「凡詔教及諸臣書疏所載條件可分者，各以類摘取分入諸志，於則書世家及傳。諸儒文集及雜錄事蹟可攷者，亦採增入，且儒制詔表冊之類，節其繁文以書。」⁴²依「凡例」所述入於列傳之人，其相關之事蹟、文集、制詔表冊皆應收錄，況秋適是 A.D.1246-1317 時人，距修史之時代極為切近，若有可考之資料應都能確切掌握，然就是未在當時史料中見到秋適編著《明心寶鑑》之線索。基於這些理由，就可能產生是否為秋適後代子孫為增加其書之重要性，而刻意偽作秋適編著《明心寶鑑》之疑義。

為了釐析上述疑義，吾人可再回到大丘仁興本《明心寶鑑》所附的資料上求證。有關秋適編著《明心寶鑑》行于世的說法，在大丘仁興齋舍本所附的資料中最早見於《晦軒實記》卷之五的「附錄」中，其文為「秋適，字貫中，秋溪人，號露堂，諡文憲，官尚書。先生（安文成）勅建太學，薦公為經史教授，所著《明心寶鑑》刊行于世。」⁴³《晦軒實記》是朝鮮學者安克權（安珣）（A.D.1243-1306）所著，其內容為作者學習見聞之真實紀錄。在《秋溪家乘》卷之一「遺事」第 4 頁至 8 頁中，曾收錄不少關於秋適的資料，其中由《晦軒實記》中錄出的遺事或詩歌就有 5 處，卻未見仁興齋舍本所附《晦軒實記》卷之五「附錄」之內容。且安克權與秋適所處的時代幾乎重疊，如果說安氏於生前確實見過此書且確知其作者為何人的話，理應在《實記》的本文中直接紀錄，而沒有理由在後人補錄之「附錄」中才補述。此外，據朝鮮·金錫奎所撰的〈露堂行狀記〉所述，秋適為高麗·高宗丙午至忠肅王丁巳年間人，忠肅王丁巳為高麗·忠肅王 4 年 (A.D.1317)，而安克權確已於 A.D.1306 先行辭世，一個已於 A.D.1306 辭世之人，確能道出 A.D.1317 才壽終的後人之諡號與致任之官職，實無可能，因此「附錄」之語當非安克權當時所述，實為後人補遺時所加入且不能置信。

據金錫奎〈行狀〉中「先生遺孫成沃陳章上聞，未及竣事，繼而竭誠殫勞，備盡闡發之道，世文是也。」所述，秋氏子孫在秋成沃時便已開始將先輩之功勳事蹟陳章上聞於朝廷，而真正竭誠殫勞繼之成事者則為秋世文。序文中還提到：

李珣在〈序〉末以「字叔獻」的方式署名，明顯有違傳統社會的禮制規範。《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1985 年 12 月，頁 136。

⁴² 見韓國奎章閣所藏貴重圖書 3539 號，朝鮮·鄭麟趾等纂修《高麗史》第一冊「高麗史凡例」，頁 2-3。

⁴³ 《晦軒實記》卷之五的「附錄」，見韓·秋適著，金鍾國譯，《國譯增補明心寶鑑》，韓國·成均館大學校，檀紀 4292 (1959) 年，頁 187。

……公生於高宗丙午，豁達無檢束，素性然也。……所著篇秩遺失殆盡，獨《明心寶鑑》一篇行于世。……⁴⁴

金錫奎〈行狀〉作於 A.D.1864 年，這是在現有可考之文獻中，最早見到秋適為《明心寶鑑》作者的紀錄。同年申錫愚等人的又纂有〈神道碑銘並序〉，除補充了金錫奎〈行狀〉中修墳立祠修塋域、構齋舍、豎麗牲之石之過程外，也承繼了秋適著有《明心寶鑑》之說法。且文中還提到〈神道碑銘〉的撰寫，是由秋世文主動向申錫愚提出的，而〈神道碑銘〉之內容乃是依據秋世文所提供的史傳、家牒為主要訊息來源。據此可推知，申錫愚等人對於秋適著有《明心寶鑑》之認知，亦當由秋世文所提供。這樣的線索，卻又直接影響了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之序文的寫作。仁興齋舍本附有許性齋所撰的〈序〉文，該序作於「聖上御極之三年，丙寅五月小暑節」，「丙寅為」為李朝末高宗三年（A.D.1866）。且由許性齋的〈序〉文中可知，其撰〈序〉之依據乃是循申錫愚等人纂的〈神道碑銘並序〉的內容而來，其云：

……我 哲宗朝春官大宗伯 申公錫愚序而銘之。申公博聞多識人也。故耳目所未逮前六百年事蹟頗詳。……⁴⁵

其次在許性齋撰的〈序〉文中還提到，秋適「其書有《明心寶鑑》一卷，為目凡十九」，但其依據卻是來自於秋世文等人的請求，因此只能「謹按其家乘而序之」，⁴⁶此處除透漏了許氏本人並未親見其書外，還呈現了秋世文積極主動運作之舉，這與其他諸家為《秋溪家乘》作序的過程如出一轍，這點在同時為《秋溪家乘》與《明心寶鑑》作序的李源祚身上，就可得到印證。

……事若有待而理不終泯，如此後孫世文、應齡將哀梓而壽諸梓，要余丁乙遺事碑表及呈褒儒狀墓頌顛末建院事實，隨事隨錄，各成一書，諸名碩所敘述亦隨而異名。登梓之際，類例不可不歸一，遂合而名之曰秋溪家乘記，其概俾書予卷。空露堂公所編《明心寶鑑》，自為一書，不入於錄中。崇禎紀元後四丁卯流頭節資憲大夫前行工曹判

⁴⁴ 同注 16。

⁴⁵ 同注 17。

⁴⁶ 許性齋的〈序〉云：「……今其苗裔之居達城者世文、鶴九、基豐，夏暑兩數百里而來，徵弁卷之文，固辭而固請，嘉其追遠之誠，謹按其家乘而序之。」見韓·秋適著，金鍾國譯，《國譯增補明心寶鑑》，韓國·成均館大學校，檀紀 4292（1959）年，頁 201。

書兼知春秋館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星山李源祚謹書。（《秋溪家乘》李源祚〈序〉）⁴⁷

……秋文獻公，當麗代荒厯之辰，能自明於心，以心為師，于以剏賢館，而崇儒教，述而不作，以遺後人，其視寄耳目而騰口舌者不其賢歟？其裔孫將登諸梓，請余讎校，余覽之斂衽，曰：「言行一致，而今人尚言，古人尚行。此書之有補於世不尠。」遂略敘述語于後。篇目類例，有許性齋序。不復贅。崇禎後五戊辰仲春，晚歸山人凝窩李源祚謹書。（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李源祚（凝窩）〈序〉）⁴⁸

首先，李源祚在為《明心寶鑑》作序時，已先看到了許性齋的〈序〉文。其次，李源祚《秋溪家乘》中〈序〉作於「崇禎紀元後四丁卯」，即 A.D.1867 年，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的〈序〉作於「崇禎後五戊辰」，即 A.D.1868 年，即先有《秋溪家乘》之序，再撰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之序。依據本文前列【表三·《秋溪家乘》中與秋世文相關之序、跋、表、記排序】之內容考察，在李源祚寫序前已有秋世文〈跋〉、《秋溪家乘》卷之一「世系」、金錫奎〈行狀〉、申錫愚等人纂〈神道碑銘並序〉、秋尚佑〈跋〉、李敏德〈墓表〉等諸多有關秋適的資料可以參考。由《家乘》之序中所述可知，李源祚在為《家乘》寫序之前已見到了《明心寶鑑》一書，又據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之〈序〉中「將登諸梓，請余讎校」所言，李源祚還參與了《明心寶鑑》的校讎之工作，由孫世文要求李源祚對於《秋溪家乘》之「丁乙遺事碑表及呈褒儒狀墓頌顛末建院事實，隨事隨錄，各成一書，諸名碩所敘述亦隨而異名」，再到《明心寶鑑》「將登諸梓，請余讎校」之過程，都可見出秋世文刻意操作的意圖。

再則，在《朝鮮歷代名臣錄》之〈金錫奎露堂行狀記〉中提到，秋適「所著篇帙遺失殆盡，獨《明心寶鑑》一篇行于世」，⁴⁹如果說秋適編著《明心寶鑑》是如此明確的事實，那首先為該書作序、跋的李珥怎會有不提之理？甚至到申佐模（A.D.1799-1877）為大丘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作〈跋〉文的當時都有「是書刊行益久，而不書撰人名氏」之論。此外，大丘仁興本所附的《東賢號錄》卷一曾提到秋適「著有《明心寶鑑》。諡文獻，享仁興書院。」之說，⁵⁰文中之「仁

⁴⁷ 見《秋溪家乘》之李源祚〈秋溪家乘序〉頁 16 至 19。韓國·慶尚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秋溪家乘》四卷，由梧林·金相朝氏於 1996 年 11 月 3 日寄贈。

⁴⁸ 同注 35，頁 202。

⁴⁹ 此文亦見於見《秋溪家乘》卷之一〈行狀〉第 9-12 頁，且內容較之《朝鮮歷代名臣錄》之〈金錫奎露堂行狀記〉更加完整，唯本節以討論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中之相關資料為主，故錄之。

⁵⁰ 《東賢號錄》卷一云：「露堂秋適，字慣中，秋溪人，麗朝侍中。性豁達，不為檢束，安晦軒裕門人。與先生、革國學修庠序。所著有《明心寶鑑》。諡文獻，享仁興書院。」見韓·秋適，金鍾國譯，《國譯增補明心寶鑑》，韓國·成均館大學校，檀紀 4292（1959）年，頁 187。

興書院」，恰巧即南韓大邱廣域市仁興齋舍之仁興本《明心寶鑑》的發現地，且至今秋適都仍配享於該書院中。仁興書院，是豐安秋溪秋氏的始祖、高麗忠烈王時的文臣露堂秋適（A.D.1246-1317）先生的書院，為朝鮮純祖 25 年（A.D.1825）10 月，由秋適的 20 代孫秋世文創建的，⁵¹而秋世文正是仁興本《明心寶鑑》文末跋文的作者之一。「享」仁興書院之論，當為後世推崇其地位而尊奉於書院配祀之意。由於獨尊祖先秋適之地位，配享書院，其子孫因此流布其掛名編纂之書的線索推論，在不詳其原編纂的情況下，該書極有可能就被刻意冠上秋適之名刊行。為了說明此一推論的可能性，吾人可再參照申佐謨的〈跋〉文來加以印證：

……吾里中有秋姓人，流落羈孤，世業農桑，絕不言譜系、來歷，人亦不知為名德遺裔也。一日抱幾卷冊子，匣以巾之，謁余而曰：「是吾嶠南諸宗之所褒稗先世家乘、譜牒、暨邱墓碑板記實之序若文，而其中別為一書者曰《明心寶鑑》，寔吾先祖露堂所著也。弁卷之文有諸名公作，而顧未有跋文焉。敢以請。」……是書刊行益久，而不書撰人名氏，卷有謄傳栗谷李文成序跋，而亦不言誰人所輯，可異也。豈邈世代綿，書存人亡，遂失其名氏歟？抑子孫微弱，有美而不揚，莫之徵信耶？傳曰：「誦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今去露堂六百有餘年，而秋氏之家乘出焉，始知是書之為露堂所著，而使世之人咸知秋氏之為先賢裔孫。有德有之終於不掠，有如是矣。露堂諱適，字慣中，官民部尚書封密城伯，諡文憲，高麗忠烈王時人。其官歷行懿具載麗史及輿地勝覽、文獻備考、近大宗伯、海藏申錫愚撰其神道之碑，證援甚詳。寶鑑序，李判尹源祚、許侍郎傳、柳外臺疇睦、趙都正基升述焉。是數君子皆好古博聞人也，其言可信，全無庸贅，為姑書此，以美昔賢懿蹟之自此大顯，而亦以賀秋氏諸宗之為國中著族云。⁵²

原先申佐模對《明心寶鑑》的認知是「是書刊行益久，而不書撰人名氏」，甚至李珥的序跋對此書「亦不言誰人所輯」，這證明了由秋適經李珥再到申佐模的年代裡，《明心寶鑑》在朝鮮一直是以編者未詳的情況在流傳，而申佐模得知此書編者的訊息是秋世文攜先世家乘、譜牒、墓碑板記實與《明心寶鑑》來訪，由「秋氏之家乘」中才「始知是書之為露堂所著」。也就是說申佐謨對於《明心寶鑑》作者的認知，是來自於秋氏家族的「家乘、譜牒」等紀錄判斷的，並未經過詳實之考察印證。此處指稱家乘、譜牒等資料是秋世文提供，乃根據大丘仁興本柳疇睦〈序〉中的「比達南秋君世文奉是書，來請弁」之語，但柳疇睦在秋世

⁵¹ 據韓國·「大邱廣域市觀光文化情報」所載，2007 年 7 月 3 日，取自 http://global-tour.daegu.go.kr/jap/best/best_view.asp?menu_mst_cd=0001&menu_slv_cd=0004&tour_mst_cd=000013&p_page=

⁵² 同注 35，頁 211。

文敦請作〈序〉前，對此書的認知也是「未識編輯人名氏」，直到秋世文奉書請序才「始知露堂文獻公手輯也」。更有甚者，與大丘仁興本共存的《明心寶鑑》五篇〈序〉中，除卻未提及編者的李珥外，就有四篇有關秋適與《明心寶鑑》關聯的資訊都來自於秋世文，以筆者僅將序文中相關的紀錄以框線摘錄出來：

許性齋〈序〉：

高麗藝文館提學，門下侍中，文獻公秋露堂神道碑。我 哲宗朝春官大宗伯 申公錫愚序而銘之。申公博聞多識人也。故耳目所未逮前六百年事蹟頗詳。……其書有《明心寶鑑》一卷，為目凡十九。……今其苗裔之居達城者世文、鶴九、基豐，夏暑雨數百里而來，徵弁卷之文，固辭而固請，嘉其追遠之誠，謹按其家乘而序之。⁵³

李凝窩〈序〉：

……秋文獻公，當麗代荒厖之辰，能自明於心，以心為師，于以剏賢館，而崇儒教，述而不作，以遺後人，其視寄耳目而騰口舌者不其賢歟？其裔孫將登諸梓，請余讎校，余覽之斂衽，曰：「言行一致，而今人尚言，古人尚行。此書之有補於世不尠。」遂略敘述語于後。篇目類例，有許性齋序。不復贅。⁵⁴

趙嘉林〈序〉：

……腳下諸孫未知為幾人，而有世文、閻永甫終始獨賢。……第其兵燹之餘，文獻無徵，只有《寶鑑》一卷，雖是零金片羽，即天地間有數之文字也。默而不章，庸是瞿瞿。行將剏刷，裨圖垂後之方，其世譜也，家乘也次第歷舉。……⁵⁵

柳疇睦〈序〉：

上年余見案冊有《明心寶鑑》者，……恨未識編輯人名氏。比達南秋君世文奉是書，來請弁，始知露堂文獻公手輯也。⁵⁶

秋世文等兄弟敦請許性齋為《明心寶鑑》作序，許氏乃依申錫愚〈神道碑〉的資料作為秋適生平的依據，且許氏僅在「按其家乘而序之」下，便提出了秋適為《明心寶鑑》編者之說法。其次李凝窩於《明心寶鑑》刊行付梓前，因秋氏家

⁵³同注 35，頁 200-201。

⁵⁴同注 35，頁 202。

⁵⁵同注 35，頁 204。

⁵⁶同注 35，頁 206。

族請其校讎之故，依許性齋之文而作了第二篇序言。在此同時，秋世文又敦請趙嘉林作了第三篇序文，所據之由還是來自於「世譜」、「家乘」，當然秋適編《明心寶鑑》之說就更被確定了。柳疇陸在作序前，其實尚不知此書的編者為何人，還是秋世文奉上該書後，才「始知露堂文獻公手輯」，並依此寫下了第四篇序文，作實了秋適編書的說法。直到申佐模作〈跋〉時已能看到「弁卷之文有諸名公作」如「李判尹源祚、許侍郎傳、柳外臺疇陸、趙都正基升」等序文，在「是數君子皆好古博聞人也，其言可信，全無庸贅」的情況下，依秋世文提供之「家乘、譜牒、暨邱墓碑板記實」，而作下了詳盡的〈跋〉文。經過了如此繁複的過程，在秋世文「復受序、跋於名卿、碩匠，謀諸劔剛鋌梓而圖壽傳」後，秋適編輯《明心寶鑑》之說中被確認下來。由許性齋李朝高宗三年（A.D.1866）始，李凝窩、趙嘉林、柳疇陸繼之於李朝高宗五年（A.D.1868）作序，承上四篇序文申佐模於李朝高宗六年（A.D.1869）歸納出詳盡的〈跋〉，最後由秋世文作歸整與總結，這樣的推論完全符合序跋中留下寫作年代的紀錄。又鄭阿財先生曾於《敦煌蒙書研究》中歸納了秋適著書的諸多疑點：1、此書所有的李珥的序跋均不見於《李退溪全集》及歷來有關李退溪的文獻中。2、有關秋適編《明心寶鑑》之事，歷來所有文獻及《露堂全書》與高麗史傳等，均無言及。3、《明心寶鑑》全書所錄皆為中國典籍要語及先賢之佳言，而未見有韓人之文句。4、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刊於高宗六年（A.D.1868），除李珥外的所有序跋，較於秋適均為晚約六百年左右。如許傳序作於高宗三年（A.D.1865）；李源祚序、趙基升序、柳疇陸序、申佐模跋等，均為高宗五年（A.D.1867）所作；李彙載跋、秋世文跋等，均為高宗六年（A.D.1868）。顯然李珥的序跋乃為後人所偽托，而秋適為《明心寶鑑》編者的說法亦不攻自破。⁵⁷「此書所有的李珥的序跋均不見於《李退溪全集》及歷來有關李退溪的文獻中」的說法，筆者在上文李珥作〈序〉的年代之論述已曾說明，李珥 23 歲才拜入退溪之門，而其 14 歲時之作當不在退溪影響性之列，更何況李珥之文都有可能是秋世文託名之作。基於上述的論證，秋適編《明心寶鑑》一的說始作俑者為秋世文，其線索之源頭全指向秋世文將家乘、譜牒與《寶鑑》同時掛上關聯，序、跋諸作形成了一種循環論證的形況，由許性齋而下，環環相扣，資料出於秋世文，最後的跋文亦由秋世文作結。秋氏子孫煞費苦心建構其祖秋適為《明心寶鑑》編者之證據，而這些精心留下的線索，卻又成為推翻秋氏為該書編者的最直接明證。秋世文在〈跋〉中自云：「先祖文獻公露堂先生五百有四十餘歲，世遠言湮，……」，秋適卒於高麗·忠肅王 4 年（A.D.1317），秋世文為〈跋〉已在五百四十餘年之後，考文末〈序〉、〈跋〉中署明年月的最後一篇文章為申佐模於李朝高宗六年（A.D.1869）之〈跋〉，基於本文之論證可推知「仁興齋舍本」為《明心寶鑑》之節本，秋適為該書編者之說，應在 A.D.1857

⁵⁷ 參見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第四章，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頁 306-307。

年（清·咸豐七年，李朝哲宗八年）秋世文為該書作〈跋〉之時才被提出來，而秋適為《明心寶鑑》編者之說最早當在李朝高宗六年（A.D.1869）申佐模作〈跋〉之後才完全確定。

陸、結論

通過朝鮮所存的各項史料顯示，《明心寶鑑》為高麗時期秋適所編著之說法，應為秋適之後人秋世文幾經輾轉煞費苦心建構的論述，這樣的說法至少應在李朝高宗六年（A.D.1869）之後才真正的被作實下來，經由大丘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的流通，傳播至朝鮮各地甚至跨海流傳到日本。大丘仁興齋舍本雖刻意的保留了有關秋適的諸多序跋與史料，然這些資料卻也成為了疑義與釋疑的重要依據。

朝鮮·鄭麟趾等纂修《高麗史》卷一百六的〈秋適傳〉，是最早紀錄有關秋適生平的文獻資料，其修纂時間與秋適所處年代極為切近，然其中卻未提及秋適曾編纂《明心寶鑑》之任何線索。基於這一理由，就可能產生是否為秋適後代子孫，為增加其書之重要性而刻意偽作秋適編著《明心寶鑑》之疑義。

在所有《秋溪家乘》收錄的序、跋、墓表、行狀、記等文獻中，以秋世文自撰的〈跋〉文年代（A.D.1857）最早，其他作者之序、跋、表、記等文，撰寫的年代卻都晚於秋世文之〈跋〉，又參較於《秋溪家乘》其他文獻之內容當可發現，其中處處呈現秋世文刻意規劃的意圖。名義上是「攷之於秋氏家乘，博採於世之有識者」，以「務積誠意」之努力避免秋世諸賢事蹟湮沒於世，實質上卻是藉世之有識者為《家乘》寫序跋的過程，替已世遠無徵的秋氏作立名之舉。雖然《秋溪家乘》中大量的讚頌秋水鏡與其五子在朝鮮戰役中的功勳，然而這些參戰的陳述，卻未見於當時的《明史》、《朝鮮·宣祖昭敬實錄》或日本的史料紀錄之中，就連「萬曆十九年辛卯出為武康刺史」、「追贈完山府院君」、「除檢詳舍人」這樣的大事，亦未見於當時的正史紀錄，甚至「除檢詳舍人」、「武康刺史」之職的描述，亦與當時史實與職官體系不符。秋濡為「大明勗業功臣，官至戶部尚書」，曾與明太祖相遇於金山寺並助其創建王朝之事蹟，亦無法在當時中、朝、日之正史中找到相關之資料。這些對於秋氏先輩封官列爵之舉，都可能為秋世文上表李氏朝鮮後所產生，也就是說李氏朝鮮對秋氏歷代官職之認定，亦可能即出自於秋世文推動之下的結果。

大丘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中，則錄有與秋適相關的五篇〈序〉與四篇〈跋〉。李珥的序、跋皆未曾提及該書之編纂與作者問題。且此文以「字叔獻」的方式署名，對於一個碩儒來說這是不符合身分與禮制的作法。此篇〈序〉不但在李珥的文集中未見，甚至亦未聞任何學者提及或徵引，尤其是在宋明理學大興的朝鮮時

期皆未見諸文獻，亦未見諸於其他《明心寶鑑》的刊本之中，卻能在三百多年後秋家後代的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中突然出現，更難令人置信。

在編纂《秋溪家乘》的同時，秋世文等兄弟敦還請了許性齋為《明心寶鑑》作序，許氏僅在「按其家乘而序之」下，便提出了秋適為《明心寶鑑》編者之說法。由許性齋李朝高宗三年（A.D.1866）始，李凝窩、趙嘉林、柳疇睦繼之於李朝高宗五年（A.D.1868）作序，承上四篇序文申佐模於李朝高宗六年（A.D.1869）歸納出詳盡的〈跋〉，最後由秋世文作歸整與總結，這樣的推論完全符合序跋中留下寫作年代的紀錄。秋氏子孫煞費苦心建構其祖秋適為《明心寶鑑》編者之證據，而這些精心留下的線索，卻又成為推翻秋氏為該書編者的最直接明證。考之《秋溪家乘》所錄之遺事、輯錄、告祭文、參軍記、受教、合貫文、立宗文等等資料所述，皆未曾見出於秋世文所處年代之前有任何秋適著述《明心寶鑑》之訊息，而到了秋世文所處之年代，秋適著述《明心寶鑑》之說卻憑空成為了確切之看法，在詳細比對大丘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與《秋溪家乘》中所錄之〈序〉、〈跋〉資料可發現，除卻秋世文本人之文章外，有許多重出處，可推斷今日所見之大丘仁興齋舍本《明心寶鑑》與《秋溪家乘》應為同一時期刊刻之典籍，非為秋適所處年代之作，二者間具有承繼抄襲之關聯且都同出於秋世文刻意之操作之結果。因此筆者推論，在秋世文編纂《秋溪家乘》之前，《明心寶鑑》與秋適應無確切之關聯，而秋適也應非《明心寶鑑》一書之編者。

大丘仁興本齋舍《明心寶鑑》只有十九篇，兩百四十二條，與今日所見范立本所輯之 775 條《明心寶鑑》相較，僅有三分之一左右。據筆者箋校《明心寶鑑》之過程統計，與朝鮮流傳秋適所編纂之大丘仁興本參照，在版本結構上關係較密切的為《清州本》、《黑口本》、《西譯本》，⁵⁸大丘仁興本與《清》、《黑》、《西》相同者計有 22 處，如〈順命篇第三〉16 條四者皆無「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一句，〈訓子篇第十〉11 條「女年長大，莫教遊走」四者皆作「女年長大，莫令遊走」等。其中《清州本》、《黑口本》與大丘仁興本的關係特別密切，其相同之處竟有 67 次之多，如〈繼善篇第一〉25 條「子孫未必能守」三者皆作「未必子孫能盡守」，同條「以為子孫長久之計」三者皆皆缺「長久」二字，且於句末多一「也」字，作「以為子孫之計也」。這樣的訊息顯示，朝鮮的大丘仁興齋舍本應該是在《明心寶鑑》成書的初期傳入該國的，且與較早的《清州本》、《黑口本》關係密切，雖為略抄本，卻也是成書不久後最初始時抄略之版本。在本文撰寫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在《明史·列傳》一百二十六〈李

⁵⁸ 《清州本》指《新刊校正大字明心寶鑑》，為洪武二十六年刊行文前附有范立本序文之版本，見於日本筑波大學之館藏，本文簡稱《清州本》。《黑口本》指《新刊大字明心寶鑑二卷》，為明初刊行黑口本，見於傅斯年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之微卷，簡稱《黑口本》。《西譯本》指《Beng sim po cam》，由西班牙傳教士 Juan cobo 編譯，藏於西班牙馬德里國立圖書館（編號 6040），1595 年，簡稱《西譯本》。

成梁傳》中，載有李成梁在高祖英自朝鮮內附之線索，李成梁正是「壬辰倭亂」援朝抗倭之提督李如松之父。李如松其原籍應為朝鮮人，且在《朝鮮·宣祖昭敬實錄》中也談到了朝鮮人對其之認知，而據《家乘》所述秋水鏡曾隨李如松援朝並攜其子返國定居，如果此一線索可逐一得到證實的話，那《明心寶鑑》一書便有可能藉李如松之管道，由中國傳入朝鮮。李如松、秋水鏡與《明心寶鑑》相關之可能性，則尚待學者作進一步的釐析。

參考文獻

原文刊本

《新刊校正大字明心寶鑑》，洪武 26 年（1393）范立本（日本：筑波大学和漢貴重圖書）。

《新刊大字明心寶鑑》二卷，據明洪武年間刊本影印，民國 88 年（1999）江澄格贈書，收藏於台灣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庫 2。

《新鐫京板正譌音釋提頭大字明心寶鑑正文》上、下卷，日本京都大學貴重資料畫像庫，近衛文庫，（明）王衝校，和刊·寬永 8 年（A.D.1631）·覆書林弼廷陳氏刊本，太倉緱山王衝校、書林弼廷陳氏梓，卷末署「《寬永辛未三月道伴刊行》」。

《Beng sim po cam》，Juan cobo，西班牙馬德里國立圖書館（編號 6040）（1595 年）。

和刊秋適本《明心寶鑑》，朝鮮總督府警務局寄贈，著作兼發行者秋丙九，印刷者朴善奎，日·昭和 2 年 2 月 20 日發行（1927 年）。

朝鮮·鄭麟趾等纂修，《高麗史》第一冊，韓國奎章閣所藏貴重圖書 3539 號。

朝鮮·鄭麟趾等纂修，《高麗史》第六十四冊，韓國奎章閣所藏貴重圖書 3539 號。

朝鮮·秋世文等編，《秋溪家乘》四卷，韓國：慶尙大學圖書館古書室「文泉閣」藏，由梧林·金相朝氏於 1996 年 11 月 3 日寄贈。

專書

李朝全點校/譯注，《明心寶鑑》（北京：華藝出版社，2007 年 1 月）。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第四章（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韓·秋適著，金鍾國譯，《國譯增補明心寶鑑》（韓國：成均館大學校，檀紀 4292（1959）年）。

韓國人族譜編纂委員會，《韓國人族譜》（韓國：日新閣圖書，1982 年 11 月）。

期刊論文

王秋華，〈明萬曆援朝將士與韓國姓氏〉，《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4 卷第 2 期（2004 年 6 月）。

陳慶浩，〈第一部翻譯成西方文字的中國書…《明心寶鑑》〉，《中外文學》第 21 卷第 4 期（1990 年 9 月）。

學位論文

周安邦，《明心寶鑑》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6月）。

網路資料

韓國・「大邱廣域市觀光文化情報」，http://global-tour.daegu.go.kr/jap/best/best_view.asp?menu_mst_cd=0001&menu_slv_cd=0004&tour_mst_cd=000013&p_page=，2007年7月3日查閱。

朝鮮・金福漢，〈明副摠兵贈完山府院君洗心堂秋公神道碑〉，http://gsm.nricp.go.kr/_third/user/search/KBD007.jsp?ksmno=3746，2009年12月25日查閱。

Textual Criticism on the Theory of *Ming Xin Bao Jian* Not Compiled by Qiu Shi

*An-Pang Chou**

Abstract

Ming Xin Bao Jian is the first ancient Chinese book translated into Western languages. Inferred from the earliest edition existing today, its compiler should be Fan Li-ben of the Ming Dynasty of China. In the popular South Korean drama, *Da Chang Jin*, the leading lady character is described as clever and sensible from childhood and diligent in learning. She finished studying books such as *Qian Zi Wen* and *Ming Xin Bao Jian*, etc. at the age of seven, which shows that *Ming Xin Bao Jian* entered the Korean culture long ago and its sustained influence continued until today.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in South Korea that the compiler of this book is the learned Confucian scholar official, Qiu Shi, of the Goguryeo Kingdom. However, its content all comes from the maxims and aphorism of Chinese classics of China's past dynasties, and it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thinking also correlate with the Confucian id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otally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Goguryeo literature. Why is there such a view that Qiu Shi compiled the book, and under what kind of circumstances that Qiu Shi was related to *Ming Xin Bao Jian*? The question has not been explored and analyzed by scholars yet. Through the documents retained from China's past dynasties in *Ming Xin Bao Jian* and *Qiu Xi Jia Sheng* of Ren Xing Zhai She, together with related materials from

*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ungtai Institute of Health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History of Goguryeo, History of Joseon and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this study infers that the key role behind the argument is Qiu Shi Wen—descendant of Qiu Shi—who, from *Qiu Xi Jia Sheng* extended to *Ming Xin Bao Jian*, carefully planned and progressively established the theory that Qiu Shi compiled the book.

Keywords: *Ming Xin Bao Jian*, Joseon (Korea), Qiu Shi